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اسياستى

ཀུང་གོ་འཛམ་གླིང་སྤྱི་དྲུང་།

目錄

131

社論

堅持國家統一、台灣才有前途……………劉學鈞……………(封面內)

學術論著

中國大陸學者對維吾爾族先民——回鶻的研究概述……………熊坤新……………(1)

清代欽命勘分中俄科塔邊界大臣的滿文和漢、哈文兩件文書譯注……………何星亮……………(8)

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唐努烏梁海西部中俄邊界的劃定與阿穆哈河地區割歸俄國……………樊明方……………(11)

成吉思汗傳(十五)……………恩和塞汗……………(23)

學術活動及 會務報導等

「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系列演講」摘要(五)——維吾爾族的社會與文化……………林冠群……………(31)

中國邊政協會第卅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林恩顯……………(35)

中國邊政協會第卅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記錄……………林恩顯……………(36)

大會集錦……………黃旭慶……………(44)

編後語……………張華克……………(封底內)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

社論 堅持國家統一、台灣纔有前途

劉學銑

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確定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公民直接投票的選出，這在我國憲政史上，是空前的創舉。這次大選競爭極為激烈，一共有四組人馬投入競爭，他們競爭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副總統，這四組人馬之中，如果有那一組不維護中華民國的生存與壯大，那麼這一組候選人在參選之初，就欺騙了他們自己，如果連自己都敢欺騙，這種人一旦當選豈有不騙盡天下蒼生？相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緊要的關頭，必然會作出理性的抉擇。

中華民國自西元一九一二年創立之後，至今業已八十五年，這期間從來沒有一天滅亡過，不錯，中華民國有效管轄區自西元一九五〇年後，是縮小了許多，但是中華民國的存在這個事實，絕不因此而改變，晉室東遷、宋朝南渡，其為晉、宋者如故，至於所謂「東晉」、「南宋」，乃是後代史家所加，對中華民國而言，我們都不是後代史家，自不能任意改變國家的稱號，這個事實相信能獲得舉國上下的認同。如果再退一步說，假設劉氏家族原本財大業大，經過若干年後，由於子孫經營不善，只賸下一幢房子，其為劉姓子弟的事實，並不因此而改變，豈可因為家業的流失，而改名換姓？

誠然，目前大陸由中共所控制，這也是一個事實，然而中共所奉行的馬列唯物思維邏輯，基本上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相左，終究要被中國博大精深，歷史悠久的文化所推翻或改造，中共當局未嘗不知道這種必然的演變，所以早在幾年前就宣稱：目前在

大陸所推行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是改造的起步，未來必將逐步的改變下去，最後一定會向傳統文化認同回歸。中華民國雖然播遷台灣，但是仍然秉持傳統的歷史文化，換言之，只要我們能夠堅持既有的一切，海峽兩岸終將回歸於中國的傳統，也就是說我們中華民國只要堅持國家統一的信念，最有機會統一中國。

目前台灣地狹人稠，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高達六百人，台北地區更高達萬人以上，地下資源貧乏，發展的空間幾已超過飽和狀態，但是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們有高知識水準的國民，在各行各業都擁有專門技術人才，有行政及企業人才，還有傲人的外匯存底，最難得的是在台灣的二千一百萬中國人，都保有中國傳統的人文思維邏輯；反觀大陸地區，如果從東北的滿洲里到西的昆明畫一直線，線以東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但是地下資源只有百分之六，但是在線以西情況正好相反，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地下資源，卻只有百分之六的人口。如所周知，未來國家的發展，必須有豐富的地下資源，才能夠使國家工業化、現代化，不錯，線以西的廣大地區生活條件確較線以東差，尤其雨量不足，其實這只是以往千百年來，歷代政府把建設的重心放在東南，對西北地區缺乏規劃建設，我們應該知道長江、黃河都發源於青海，而西北地區高山極多，其頂終年積雪，只是沒有加以規劃運用而已，水源問題一旦解決，邊疆地區與東南沿海生活條件差距縮小了，正是中華兒女拓展抱負的大好空間。

（作者為本刊主編）

中國大陸學者對維吾爾族先民——回鶻的研究概述

熊坤新

回鶻人，作為維吾爾族的先民，曾經活躍在中國西域的歷史舞台上；但幾經歲月流轉，大浪淘沙，回鶻人卻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而消失並不意味著消滅，祇是被鏽鏽進現代維吾爾族的機體中罷了。不過，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人們對回鶻人曾經生活過的一段社會歷史狀況仍然備感興趣，對其研究的視野和視角亦極廣泛。這裡，茲將大陸學者對維吾爾族先民——回鶻人研究的有關情況略述如下，或許能引起有關學者的興趣。

一、關於回鶻之族名問題

關於回鶻之族名問題，大陸學者大抵有三種看法：

其一是認為，歷史上與回鶻有關的不同稱謂，都是同源同義的別稱，所不同的祇是稱謂不同而已。如王日蔚先生在《維吾爾民族名稱演變考》（載《禹貢》卷七第四期）、郭應德先生在《維吾爾史略》（上海東方書店一九五二年版）、馮家昇先生在《維吾爾族史料簡編》（民族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等論著中就認為，元魏之袁紇，隋之韋紇，唐之回紇，回鶻，元之畏兀兒，現代之維吾爾，都是Uigur一詞之漢語的音譯。其主要含義皆為「同盟」或「聯合」之意。

其二是認為，回鶻的別稱是鐵勒。如谷苞先生在《維吾爾族源問題》（載《古代新疆的音樂舞蹈與古代社會》，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一文中就強調：「鐵勒就是回紇，是一個民族的兩個稱號。」另外，蘇北海先生在《維吾爾族源新考》（

載《新疆大學學報》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則將古代西域的回紇、丁零、狄等與回鶻相等同，認為它們也是與回鶻之同源同義的不同稱謂。

其三是認為，應將回紇的族稱與鳥圖騰聯係起來加以考察。如楊聖敏在《試論回紇宗教思想的演變與改宗摩尼教》（載《西北史地》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一文中認為，丁零在先秦時稱為狄，狄人以翟鳥作圖騰，故被稱為翟族。翟鳥是一種有利爪、輕捷善飛的黃色獵鷹，深得回紇人的崇拜，甚至回紇人中有以翟為姓。據考證，回紇人在七八八年要求改名為回鶻，其義就是取翟鳥「回旋輕如鶻也」。作者推斷，這大概就是遠古時代的翟鳥圖騰在回紇人意識中留下的痕跡。

二、關於回鶻之族源問題

關於回鶻之族源問題，大陸不少學者都認為，不能把西域歷史上的丁零、高車、鐵勒等族體看成是回鶻的惟一族源，更不能在牠們之間劃等號，或者把牠們看成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關係。如王日蔚先生在《維吾爾民族名稱變考》中稱：「考諸史均謂回紇為鐵勒之一部，而非回紇即鐵勒。」

周偉洲先生大在《也談新疆維吾爾族源問題》（載《西北歷史資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中亦云：維吾爾的族源問題不應與民族形成問題攪在一起，如果不加區別，就會使一部中國北方民族史變成一部單一發展的民族史。他說：「新疆維吾爾族的族源，我認為首先應追溯到八世紀中在漠北草原建立的回鶻汗國，再由此追溯到五世紀在突厥、鐵勒（高車）的共名之下出現的烏護

、袁紇、韋紇部，再往上則不見史書記載，而僅有與上述自稱為『Yghur』或『Uyghur』部落具有基本相同的語言（突厥語族）和風俗的丁令、高車、鐵勒、突厥等。這是條探尋新疆維吾爾族源的基本線索。」同時他還認為，回鶻於七四四年立國後即融合了漢北的一些部族，西遷後又融進當地諸族，由此而漸漸形成了維吾爾族。相對來說，維吾爾族「與鄂爾渾時代的回鶻族，不論從哪方面看都有了區別，有了新的特點。」

維吾爾族出身的阿合買提江·艾海提先生在《維吾爾族族源新探》（載《新疆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一文中亦說：如果「把中國歷史上的丁零、高車、鐵勒，這些中國古代操突厥語族的共名的民族，籠統地當作回紇的族源，是極不妥當的。」他堅定地認為，北方民族各部落不可能是一個祖先，或一個單一民族的發展歷史。

楊聖敏先生在《回紇人的種族特徵試析——兼評維吾爾族與其先民回紇之區別》（載《甘肅民族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中亦認為，回紇人當屬北亞蒙古人種。他通過列舉中外學者運用人類群體遺傳學方法對現代維、哈、漢、回等民族所進行人種特徵之調查研究，得出了現代維吾爾人種當屬蒙古人種並混有高加索人種血緣的看法。他認為，這種人種血緣上的混雜，是與回鶻之西遷有關的，特別是八四〇年蒙古人種之回紇徙居西域後即與當地高加索人種融合，逐漸形成了現代維吾爾族。因此他非常肯定地認為，蒙古之回紇人及新疆本土的土著民族，均應被看成是現代維吾爾族的先民。

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不僅適合用來分析和看待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的族源問題，而且也適合用來分析和看待象維吾爾族、蒙古族、藏族等這樣一些作

為單一民族的族源問題。因為幾乎所有的現代民族，他們在其歷史發展進程中，就其族源而言，都不可能是單源的，而祇能是多源或多元的。

三、關於回鶻之社會制度問題

關於回鶻之社會制度問題，也是大陸學者在探討回鶻問題時較感興趣的一個問題。

郭應德先生在《維吾爾史略》一書中肯定地認為，吐迷度稱汗以前的回紇之社會性質，當處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階段。而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中則認為，吐迷度稱汗以前的回紇人雖尚處於原始社會，但是牠卻「已經在變化，時健和菩薩任酋長時期，正是變化的開始。」在范先生看來，那時通過戰爭，回紇社會裡已有了一定數量的牧奴和家內奴隸，「貴族與本部平民也在形成為階級」。與此意見相近的是，穆廣文先生在《試論東部高車和早期回紇的社會性質》（載《民族研究文集》第二集，一九八三年版）一文中亦認為，吐迷度建國以前，回紇社會已處於原始社會末期即原始公有制面臨解體，私有制即將確立的時期。

對於吐迷度建國以後回紇人所處的社會究竟屬於什麼性質，學界亦有不同的看法。郭應德先生在《維吾爾史略》中認為，那時的回紇人社會已「由原始共產主義一躍而為游牧的封建社會」，其理由是「游牧社會無法嚴密監督奴隸勞動」，且已受到隋唐兩代封建社會的影響。張廣志先生在《回紇與奴隸制》（載《青海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一文中卻認為，回紇社會並沒有經歷過奴隸制度發展階段，其因主要是回紇內部的經濟條件不適合於發展奴隸制。程溯洛先生在《維吾爾族居住新疆考》（載《西域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五年版）中也認為，吐迷度

建立的政權祇能是游牧封建政權。而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則說，吐迷度建立的汗國，「由於內部缺乏發展奴隸的條件，來自唐朝的封建社會的影響又特別強大，因而封建制度在回紇社會裡發展起來。」

有的學者認為：回紇人並不是由原始社會一躍而進入封建社會的，他們顯然已經歷了不發達的奴隸制社會後才進入封建制社會；吐迷度統治時期回紇社會尚屬早期奴隸佔有制社會；其奴隸社會不發達的原因除了唐朝封建社會的影響等因素外，應該說作為生產資料的牲畜的兩重性和游牧部族的特徵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應忠先生的《試論公元七—十世紀回紇的社會制度》（載《廣西師院學報》一九五九年第一期）一文即持此說。同時他還認為，直至公元八世紀末，回鶻才進入封建社會，且發展進程緩慢，尚帶有大量的原始公有制殘餘。

范文瀾先生認為，回紇社會中雖然有奴隸存在，「但不成為基本階級，因為奴隸勞動沒有大量地使用在汗國主要經濟部門的畜牧業上。」（見《中國通史簡編》）張廣志先生在前引文中亦認為，回紇汗國中的生產階級和國家武裝力量的基本成員主要是普通牧民，他們有自己的牲畜，是私有者，與統治階級是納稅、服兵役的關係，和中原編小農的情況相似。回紇對被征服部族也未實行奴隸制式的統治，其部族有自己的社會結構，回紇人是派監使監察其政，督責貢賦，隸屬也比較鬆弛。王天序等人則認為，回紇社會中商業、手工業城鎮等的興起，是回紇社會中封建因素有所發展的表現。因為在回紇為高車之一的時期，北魏政府就曾對高車施行封建的戶調制，到了唐朝，唐王朝中央政權會通過對回紇的冊封、聯姻、通商等形式，將其政治、經濟、生活方式等滲透到回紇社會內部，使其發生或多或少變化和影響。

（參見《甘肅民族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二期）另外，邢有德、周泮池先生在《略論回紇》（載《河北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中亦認為，回紇的封建化除了自身生產力發展的因索外，唐朝與突厥的影響的確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很明顯，在東突厥滅亡之前，已處於封建社會中。而回紇的首領骨力裴羅曾做過突厥的葉護，突厥的宰相，欲後來也做過回紇的宰相。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突厥的社會對回紇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就回紇之社會性質而言，祇能是處於奴隸制社會形態下的一種社會制度，而不可能是別的。如林幹先生在《試論回紇史中的若干問題》（載《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選集》，一九八七年版）一文中就持此種觀點。他通過列舉回紇統治階級一貫擄奪人口，迫使契丹、韃靼為種族奴隸的事實，說明「回紇與突厥兩族內部都還沒有產生封建的經濟因素，出現代表封建生產關係的新興階級，因而在大漠南北，在突厥奴隸制政權崩潰後興起的回紇政權，祇能是一種奴隸制代替另一種奴隸制。雖然是政權的統治民族改變了，但社會性質和政權性質不可能發生質的變革，因而回紇社會仍然是一個奴隸制社會，回紇政權也仍然是一個奴隸制的政權。此外，馬亞萍女士在《七至八世紀回紇社會性質簡論》（載《甘肅民族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一文中也很肯定地認為，吐迷度建國後，回紇社會一直是處於奴隸制社會形態中。

四、關於八四〇年前新疆之回鶻人問題

多數學者認為，西元八四〇年前，新疆已有回鶻人居住，且與其他族體相融混。如樊嘯先生在《維吾爾族居新疆考》（載《光明日報》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一文中認為，丁令、敕勒

、高車是等同關係，都是今天「維吾爾族的祖先，是遠在第四世紀的時候，就居住在今新疆地區了」，「五世紀的時候，已經達到高昌一帶。」蘇北海先生在《維吾爾族源流新考》一文中強調：「匈奴貴族沒有統一草原以前，丁零族即已分佈在貝加爾湖以南，及西直到額爾齊斯河、巴爾喀什湖一帶的廣大地域」，「所以，早在公元前維吾爾族就已分佈在天山南北。」程溯洛先生在《維吾爾族居住新疆考》一文中則認為：「在八四〇年回紇從蒙古草原上西遷以前，大約公元七、八世紀中，新疆地區已有不少回紇人，即維吾爾人；如果把牠的祖先丁令、敕勒（高車）計算在內，則從公元四到六世紀中已有幾拾萬（六、七拾萬）鐵勒人或高車人生活在天山南北；從公元前三世紀末，已有西支丁令人住在天山北部了。」

有學者認為，不應把民族的形成問題和民族的族源問題攪混在一起，同理，也不應該把丁令的活動簡單地等同於回鶻在新疆的活動。如周偉洲先生在《也談新疆維吾爾族族源問題》一文中就說：《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魏略·西戎傳》中記載的公元一世紀左右從匈奴中逃到甘肅北部的丁令，並非爾後的回鶻人；這部分丁令後來已逐漸融合到當地的漢族或鮮卑中去了，而決不會在四五百年後再變成回鶻人。另外，《魏略》中所說的西丁令當是在今新疆地區，他們與後來的回鶻祇不過是同屬於突厥語族而已，其後是否已完全融合到回鶻中去了，尙難考證。可以確信的是，突厥汗國興盛時代，新疆地區的鐵勒人之活動範圍主要在高昌北之貪汗山北，臣屬於突厥，隋大業元年（六〇五）敗突厥，其莫何可汗征服了伊吾、高昌、焉耆諸地，至唐初，這一帶又為西突厥控制，直至貞觀末年被唐滅為止。在高車、鐵勒、突厥的統治下，高昌地區已有明顯的鐵勒化傾向。

但這種所謂鐵勒化、突厥化並不等於回鶻化，也不等於該地區已有了大量的回鶻人。周先生認為：「八世紀末，安西、北庭一帶的回鶻部落的勢力是很大的。」因此，新疆和甘肅之有真正自稱回鶻的人民，當是在回鶻汗國建立的前後。

郭平梁先生在《回鶻西遷考》（載《西域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五年版）一文中認為：「從七世紀中到八世紀末，回鶻在新疆及新疆以西的活動有時是頻繁的，特別是在後期，在北庭至西洲一帶，持續的時間相當長，但是，無論如何，回鶻之成為新疆的主體民族，那是八四〇年以後的事。」郭沫若先生在《坎曼爾詩箋》試探》（載《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一文中也認為：「詩箋」署名前的「紇」字，是坎曼爾的族稱，表明他是回紇人。即是說，在唐元和年間（八〇六—八二〇），米蘭古城有回紇人。郭平梁先生在《有關坎曼爾詩箋》的若干史事》（載《新疆文史》一九九二年創刊號）和《紇·霍爾·回紇》（載《西域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兩文中根據大量的吐蕃文資料，特別是和田馬扎塔格及米蘭出土的吐蕃文簡牘和文書，論證了這一帶在吐蕃統治時期確有回紇人；他們在吐蕃文資料中一般被稱作霍爾，如果證之以當時的譯例和資料，則可以確定地說，霍爾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回紇或回鶻。

五、關於回鶻與唐朝之關係問題

多數學者認為，回紇與唐朝的關係是較為密切的，而且表現於諸多方面。

首先是在經濟貿易特別是在馬絹及其價格方面。如劉義棠先生在《回鶻馬研究》（載《維吾爾研究》）一文中就認為：絹馬貿易是回鶻與唐朝之間進行的一項經常性的以互利為目的經濟活動。其社會政治背景當與安史之亂後國內戰爭頻起，軍馬不足，

以及唐朝必須聯合回鶻，以對付吐蕃的外交政策有關。扎奇斯欽先生在《對「回鶻馬」問題的一個看法》（載《食貨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七一年）一文中也認為：回鶻與唐朝之間的貿易，「是以政治和軍事為其背景的。」在價格問題上，劉義棠先生在上文中列舉史料證明：在較為頻繁的唐回絹馬貿易中，既有唐朝方面抱怨回鶻馬來得太多，價格過高等問題，也有回鶻方面抱怨唐朝拖欠馬價太多，絹帛疏織短截而無用等問題。札奇斯欽先生在上文中也列舉唐回在馬絹貿易最盛的四十餘年中，唐朝所付馬價絹總數和回鶻所進馬匹總數是不相等的。他說：若馬價一直是一疋馬四〇疋絹，那麼唐朝就遠遠沒有付足馬價絹。因為據史料記載，如果把一疋馬四〇疋絹作為最高價，而在實際馬絹貿易中，卻常常有一疋馬十疋絹或一疋馬二〇疋絹的。當然，馬絹貿易確實促進了回鶻社會的商業發展。有些回鶻人甚至選用絹帛去做倒手買賣的。如樊保良先生在《回鶻與絲綢之路》（載《蘭州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一文中就說到有些回鶻人在從事馬絹貿易中，有的當牙儉、有的做中人、有的搞倒買倒賣等情況。特別是八世紀中葉以後，唐朝通過回鶻路與西域諸國聯繫，回鶻亦為疏通絲綢之路，發展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面均作出了貢獻。陳俊謀先生在《試論回鶻路的開通及其對回鶻的影響》（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一文中亦認為：回鶻路是回鶻汗國的生命線，回鶻人在這條路上經商，使商品經濟成為回鶻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手工業，以及城市和文化的發展。

其次是在政治聯繫方面，回鶻曾幫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亂」，功不可沒。如劉義棠先生在《安史之亂與唐回聯軍之研討》（載《維吾爾研究》）一文中就論述了唐回聯軍的歷史背景、平亂

過程和唐朝的政策。指出安史之亂後，請求助唐的除回鶻外，還有吐蕃。唐朝經過慎重考慮，選擇了回鶻的援助。但回鶻軍隊進入中原後，即發現唐朝很虛弱，於是便顯得驕橫起來，而唐朝為了獲得其幫助，則採取「極度寬容、容忍、放任之態度」，進而助紂成虐，以至使他們產生「劫掠、寇抄、強暴、殺人、放火等傲慢任性行為」，「卻又使李唐帶來無限困擾」。作者認為，這既是唐回聯軍的一個後遺症，亦是安史之亂的一個後遺症。但得失相比，唐回聯軍仍然是「其功勝於過者也」。林幹先生在《試論回紇史中的若干問題》一文中也有專節論及此事。他在充分肯定了回紇助唐平亂的歷史功績時，也嚴肅地指出了其負面作用所帶來的後遺症：「回紇統治者並非真心助唐平亂，祇是趁火打劫，企圖從中攫取暴利，故祇要有機可乘，即叛唐通敵，甚至背信棄義，倒戈相向。」劉戈先生在《論回紇可汗頓莫賀達幹》（載《西域史論集》第一輯）一文中卻認為：回紇在平亂之後，雖然居功自傲，胡作非為，甚至牟羽可汗在九姓胡的煽動下，還打算與唐為敵，「舉國為寇」，但這並不意味著代表回紇的民意；宰相頓莫賀勸阻無效，遂殺掉牟羽可汗及其親信和九姓胡等，自立為汗，然後遣使唐朝，「愿為藩臣，垂發不剪，以待詔命」，這才反映了回紇之民心所向；在唐使尚未到來之時，頓莫賀獲悉其叔父突董等九百人被唐振武軍留後張光晟殺害，此事在回紇人中引起很大震動，但頓莫賀仍以政治家之遠見卓識妥善處理此事，繼續與唐修好，應該說這是符合唐回關係良性發展的深明大義之舉。楊博文先生旋針對劉戈先生文，發表《試論回紇與唐關係的幾個問題——和劉戈同志商榷》（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一文，認為「頓莫賀的擊殺登里（牟羽），決非珍惜與唐中央的和好與否的問題」，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保全「回

紇本身的前途與安全」；突董事件是「回紇在平安史之亂後，恃功驕詐，不遵守唐廷法度」，因而人們對其有厭煩情緒，「是回紇人咎由自取」。劉戈先生在〈就「回紇與唐關係的幾個問題」答楊博文同志〉（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一文中則認為：頓莫賀爲了「回紇本身的前途與安全」，力爭與唐保持和平友好的關係，其間並不存在矛盾；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人，是一種暴行，理應受到譴責；頓莫賀對突董事件的反映是非常適度的，他用「以水洗血」的方式來處理民族間的誓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如果用「挑剔」的眼來看待這類事，顯然是失之公允的。

再就是通過和親方式來加強回唐關係。鄭平章女士早在二十年代就發表了《唐代公主和親考》（載《大公報史地週刊》第五〇期，一九二四年）一文，其中第九章專門論及唐回和親關係問題。她認爲：唐與回紇聯姻，「回紇有勸亂之功，歲得馬價絹以萬計，而唐民苦賦斂，膏血爲之竭矣，所謂功之大者，其爲害亦深。」就和親的動機來看，一是羈縻，一是借師。王桐齡先生在《漢唐之和親政策》（載《史學年報》第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文中高度地評價了唐帝嫁給回鶻的幾位和親公主的歷史作用，如少寧國公主配英武、英義兩可汗，在回紇汗庭生活三〇年，其間回紇助唐平定了史朝之亂，抵御了吐蕃的侵擾，她都起了積極的作用。任崇岳、羅賢佑先生在《論唐代的和親政策》（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除論述了唐代和親的特徵外，還強調了和親的作用，即不但唐朝將和親作爲爭奪與國、翦滅強敵和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而且少數民族政權也用和親來達到自己的政治與經濟之目的。唐與回紇的和親自然也不例外。劉義棠先生在《回鶻與唐朝婚姻關係及其影響之研究》（載《

維吾爾研究》）一文中也特別強調了和親的積極意義，他認爲回唐和親不僅增進了兩大民族間的感情，而且還促進了兩族血緣的融合，特別是在助唐勘亂寧邊中，加強了相互往來，促進了文化交流，有利於彼此了解和民族親近。

還有就是回鶻與唐的關係究竟是隸屬關係還是並列關係，許多學者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程溯洛先生在《回紇的興起及其和唐朝的關係》（載《歷史教學》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一文中認爲：公元六四六年回紇助唐滅薛延陀，首領吐迷度受唐冊封，唐於其地設立府州，回紇地區與唐中央是一個國家以內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唐在回紇地區實行羈縻府州制度，任用其本族中的上層自治其地，實行間接統治，表明這又不同於一般的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刑有德、周泮池先生在《略論回紇》一文中亦認爲：菩薩及其繼承者吐迷度建立的政權，不是國家觀念下的政權，而是屬於唐朝中央管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秦衛星先生在《關於漠北回鶻汗國早期歷史中的兩個問題》（載《新疆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三期）一文中則認爲：吐迷度建國以後，回紇地區實行著兩種體制，一方面唐朝在其地置府州，冊封官吏；另一方面回紇內部也模仿突厥官制，設有各種官職。這兩套官制存在著對應關係，回紇的首領們集兩種官制於一身。唐朝冊封的官號，既可以視作官職，也可以視作名譽稱號，唐朝不可能牢固地控制他們並通過他們在漠北地區行使有效地管轄權。他說：「要說自從唐朝設立這些府州以後，它便在漠北地區行使有效主權，並且將這一地區納入了唐朝的版圖，是缺乏說服力的。」他認爲，唐朝雖然都護府的作用，僅僅在於以導賓貢。特別是六六三—六六九年，唐移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本部，改稱瀚海都護府，並直接派官監護其國。應該說，唐在這七年中對漠北地區基本上是實行了直接

的統治。他還認為，婆闍出兵助唐平阿史那賀魯一事，也不一定能夠說明回紇的軍隊就受唐調遣，從而得出回紇與唐朝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的結論。

六、關於回鶻與其他民族之關係問題

關於回鶻與其他民族之關係問題，大陸學者論及者甚少（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之故）。

路克關頓先生在《突厥以後，蒙古以前——過渡時期的中亞諸汗國》（載《西北史地》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一文中認為：回鶻人與吐蕃在西域的鬥爭，都是為了爭奪貿易壟斷權。當然，八二二年回鶻人將吐蕃人趕出塔里木盆地，「這赫赫戰果不僅在於回鶻人恢復了其在貿易上的壟斷地位，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將突厥語、突厥文化引進了這一地區，並以損害當地印歐語系諸部人民的代價，鞏固了其他突厥部落對這一地區的滲透。」

格勒先生在《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一書之第六章「古代藏族與我國北方胡系統各民族的歷史文化關係」之第五節，專門探討了「古代藏族與回鶻族的關係」問題。他指出：敦煌古藏文歷史文獻中已有對回鶻人的記載，祇不過古藏文裡常常把回鶻稱作「霍爾（Hor）」表明「藏族的先民與回紇族有過較長的來往，這是無疑的。」並認為，根據文獻記載，古代藏族與回鶻自公元八世紀開始便發生接觸和聯繫。起初雙方經常聯合起來開展共同的軍事行動。在聯繫交往過程中，「一部分回鶻人南奔吐蕃或役屬於吐蕃」，最後甚至「變成藏族的分子」。在他看來，藏族的語言文字、宗教、文學等文化現象，也曾某些方面受到過回鶻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是雙方面而決非單方面的。

總之，大陸學者對維吾爾族之先民——回鶻人的方方面面均

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由於各自所站的方位、視角、角度不同，因而在其結論和看法上，亦就見仁見智，同異相兼或迥然有別。無疑這都是很正常的，符合學術討論的普遍規律。我們相信，這些同異相兼或迥然有別觀點與看法，必將有助於這方面討論的進一步深入。

（本文作者現任職中國大陸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研究院）

（文接43頁）

的意見，除了做為本會邀請十五位民族院校長來台訪問活動討論具體交流合作意見外，有些高見也可建議行政院陸委會參考。最後也謝謝在坐各位先進會員先生女士的參與，今天的學術座談會到此結束。

士恭賀新春聯誼活動

餐敘中欣賞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鄭月裡等同學所表演新疆錫伯族服飾暨歌舞，並進行摸彩聯誼活動。茲公佈這次贈送彩品單位暨人士名單如次，以示感謝。

中國邊政協會第卅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致贈獎品單位名單

- | | |
|---------------|-------------|
| 1. 教育部 | 電熱水瓶一個 |
| 2. 省府原住民行政局 | 對筆二盒 |
| 3. 蒙藏委員會 | 燭燒鍋一個 |
| 4. 國民黨中央社工會 | 燭燒鍋一個 |
| 5. 國民黨中央陸工會 | 代金貳仟元 |
| 6.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 燭燒鍋一個 |
| 7. 本會林恩顯理事長 | 咖啡暨器具套盒 |
| 8. 本會翁福祥常務監事 | 文具五套 |
| 9. 滿族協會粘聰明理事長 | 第二屆滿族畫展畫冊三本 |
| 10. 本會廣定遠秘書長 | 台燈一個 |
| 11. 本會馬普東副秘書長 | 廚具二盒 |
| 12. 曾濱先生 | 新疆絲巾五條 |
| 13. 曾鐵先生 | 新疆絲巾五條 |

清代欽命勘分中俄科塔邊界大臣的滿文和漢、哈文兩件文書譯

何星亮

筆者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在新疆阿爾泰地委檔案館發現清代欽命勘分中俄科塔邊界大臣和卡倫侍衛所寫的文書五件，其中漢文一件，哈薩克文二件，滿文一件，漢、哈兩種文字寫成的一件。漢文文書和哈薩克文書分別已寫專文刊載，這裏就一件滿文和一件漢、哈文文書作譯註。

一、滿文文書

(一)題解

文書系清代光緒年間欽命勘分科塔邊界大臣升泰和額爾慶額之札。文書紙長三十九厘米，寬二十六厘米。寫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七月初七日，即中俄代表議定以阿拉克別克河為兩國新界後三天、《中俄科塔界約》（簽定時間為光緒九年七月十日）簽定前三天所寫。亦即在寫於七月初六日哈薩克文書後的第二天所寫。

文書內容前半部分與七月初六日的哈薩克文文書的後半部分相似，主要說明兩國談判中關於新定邊界內外的哈薩克族有自由選擇歸屬國的權利，願來大清國的哈薩克，清政府將給予游牧之地。而後半部分內容則為哈薩克文文書所無，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堆三伯特所屬哈薩克族征收的牲畜作出退還、賠償規定，並對該哈薩克族予以撫慰；二是讓堆三伯特和翻譯阿地勒伯克率哈薩克前往邊界地區，作好立界牌的準備。

一九九三年的中俄邊界談判歷時一個月。據談判前準備五十

頂艷房（蒙古包）來看（見本文漢、哈文文書），談判代表及隨行人員不少，其食宿費用必巨。而這些全由堆三伯特所屬哈薩克解決，給他們帶來極大的負擔。此外，《中俄科塔界約》換約之後，即開始建立牌博。為提前作準備，必須先挖好立界牌之坑。此件文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

筆者發現滿文文書後，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語言文字委員會鐘謙先生（錫伯族，滿語專家）轉寫成拉丁文，筆者再根據日本羽田亨編《滿和辭典》譯成漢文，並請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肖夫先生（錫伯族）校對過。

(二)譯文

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

欽命伊犁參贊大臣與科布多幫辦大臣(1)之札

為曉諭事：今與俄國大臣會商議定兩國以阿拉克別克河額齊斯河匯合處為界。……(2)對此，新界兩邊之哈薩克可任選擇一方游牧。願歸何國，聽其所願。分界之後，予以一年為限，在此期限內，兩邊游牧之哈薩克倘若彼此遷移，不予阻攔。期滿之後，兩國之哈薩克往來，應各自持有所屬國之證書。若無證書，不予放行。將此向大清國所屬之哈薩克宣諭知之。

現賞堆三伯特二品頂戴孔雀花翎，讓伊治理所屬之哈薩克。可來阿拉克別克河與哈巴河之間游牧，若其地容納不了所屬哈薩克，可再增分牧地。倘不合意，讓伊等任從選擇。為此，特派通事阿地勒伯克與堆三伯特一同持書前往哈薩克處，詳述情由，口頭宣諭。

之後，該哈薩克族等，務必勤奮差務。為各項差務而征收之牲畜將如數退還原主。若有倒斃，予以賠償。此後，再不會有此類大事，毋庸為此而憂愁不安。如此好言撫慰，將平安無事。

哈薩克之堆三伯特與通事阿地勒伯克抵達分界地後，將立界牌(3)之坑挖好，妥為準備。為此事而有功之人應予獎賞，違者懲處。準備就緒後，幫辦大臣親往阿拉克別克河邊分界立牌。(4)為此特諭。

四註釋

(1) 伊犁參贊大臣：即升泰，勘分中俄科塔全權代表。字竹珊，蒙古族，卓特氏，蒙古正黃旗人。曾任浙江按察使、雲南布政使。光緒七年，為伊犁參贊大臣，八年，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仍留伊犁參贊大臣之任。光緒十年署烏魯木齊都統，光緒十二年命駐藏幫辦大臣。光緒十二年卒。《清史稿》有傳（《清史稿》卷四三三，《清德宗實錄》卷一三〇，卷一四三，卷一九一，卷二二三）。科布多幫辦大臣：即額爾慶額，中俄勘分科塔邊界中國副代表。滿族，字鵲堂，格何恩氏，滿洲鑲黃旗人。以驍勇聞名，賜號法福靈阿巴圖魯（英雄）。曾授黑龍江副總管、涼州副都統。同治十三年，奉命出關，佐左宗棠收復新疆。光緒三年為古城領隊大臣。光緒十九年卒。《清史稿》有傳。（參見《清史稿》卷三六七，卷三七七，《清德宗實錄》卷五一，卷一一六，卷二二三，卷二四八，卷三二五）。

(2) 此處字跡脫落，無法辯認。

(3) 漢文文書作牌博。此指邊界標誌。

(4) 此文書寫於七月初七日，額爾慶額於七月十五日前往阿拉克別克河建立牌博（《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三十六，頁六一七）。據《中俄科塔界約》稱：「在阿勒泰山嶺、賽哩烏蘭之

間議定應立新界牌博，由兩邊欽派分界大臣與全權大臣一同前往，按照此約之第一條及此約所附之兩邊分界大臣所定界圖，建立交界牌博。於所定二份圖上將所立牌博名色、數目用滿文、俄文填寫，並造具邊界牌博之滿文、俄文條約四份，畫押鈴印，互換為據。」並稱「此約所定疆界建立牌博，即以本年為始，每屆扣足三年，由兩國邊界官於年中六月（即俄國伊約里月），各派官員先於會議處會晤，將牌博補行修理。」（《中俄邊界條約集》頁七〇）

二、漢、哈文文書

(一) 題解

文書紙長二二·五厘米，寬一六·五厘米，用漢、哈兩種文字寫成。寫於光緒九年五月十一日，系欽命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侍衛富保為堆三伯特所寫。旨在為邊界談判作準備，讓堆三伯特所屬哈薩克籌辦談判所需之食、宿等物。

中國勘分邊界代表於光緒九年四月初三日由科布多起程，於五月十二日先後抵達哈巴河會所。同月二十四日，俄國代表巴布科夫帶兵到哈巴河。雙文議定於六月初旬會商（《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三四，頁八一—九；卷三二，頁十九—二十）。談判所需之食、宿等物必須提前作好準備，此文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代表到達哈巴河的前一天寫的。

文書分漢文和哈薩克文兩部分。哈薩克文並不完全是漢文的譯文，哈薩克文較詳細、具體。

(二) 漢文標點

欽命管理瑪呢、圖噶、圖勒干(1)等卡倫侍衛富(2)為飭傳事照得：

欽派勘分地界大臣等來哈(3)，會同俄官查勘地址。合亟飛傳

哈目對邊伯特(4)等刻急至哈巴河來見，並預備氈房(5)五十頂、隨房什物等項，聽候運往。切切勿違。特諭。

右札仰 Duichenbet(6)準此

五月十一日(7)

(三) 漢文註釋

(1) 瑪呢、圖噶、圖勒干：清代西北重要卡倫之一。《清乾隆圖》繪有此卡倫，位於額爾齊斯河南岸。洪鈞《中俄交界全圖》註：「瑪呢、圖噶、圖勒干即阿克求別」。此次中俄科塔界約將此卡倫劃入俄屬。

(2) 富：即富保。

(3) 指伊犁參贊大臣升泰和科布多幫辦大臣額爾慶額。

(4) 對邊別特：即堆三別特。

(5) 氈房：即蒙古包。

(6) Duichenbet：即堆三伯特的滿文譯音。

(7) 署日月處蓋有正文形小印一方，當是富保的私人圖章。

四 哈薩克文譯文

……(1) 交付與爾之書是為堆三伯特烏庫爾台(2)所作之札。

兩大臣由科布多來此(3)。本(侍衛)奉令札仰爾征收稅務。

預備氈房五十五頂(4)，以及鍋、爐、灶、地毯、花氈、食物，並向爾所屬之民收取羊五百只。為此應晝夜籌辦，限本月內(5)送來。

特諭。

五 哈薩克譯文註釋

(1) 此處若干詞不清，難於辯認。

(2) 烏庫爾台：清代哈薩克族官號，源於滿族，相當於千戶長。由此可知，堆三伯特原為烏庫爾台。

(3) 兩大臣：此指升泰和額爾慶額。升泰原駐伊犁，後到科布

多與額爾慶額商酌勘界事宜(《清德宗實錄》卷一五三，頁十八)。他們於光緒九年四月初二日由科布多起程，於五月十二日先後抵達哈巴河會所(《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卷三四，頁八九)。

(4) 這裏所說的氈房頂數與漢文所記有差別。漢文文書是五十頂，而此處是五十五頂。

(5) 此月內：原文作「osiyding nq(ux)義為「三」。如按nq(ux)譯，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得晚於本月三日送來。此札寫於五月十一日，於此有矛盾。準備氈房、征收羊隻為會談而用，而會談定在六月初旬，故其限日期必在五月內。據此，nq(ux)當是「iq(ix)」之誤。iq(ix)為「里」、「內」等義。「osi ayding ixi」即在「本月內」。



中國邊政協會第三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理事長林恩顯教授致詞

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唐努烏梁海西部中俄邊界的劃定與阿穆哈河地區割歸俄國

樊明方

一七二七年中俄《布連斯奇界約》劃定了沙賓達巴哈以東的中俄邊界，俄國向克穆齊克河流域及其以東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的公開發張受到了遏制，但是沙賓達巴哈以西的中俄邊界長期沒有劃定，俄國利用這一情況，繼續從西方向唐努烏梁海擴張。早在《布連斯奇界約》簽訂之前的一七〇九年，俄國已在唐努烏梁海西部與俄國的交界點——阿勒坦河與哈屯河的匯合處建立了比斯克堡，作為向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和唐努烏梁海擴張的基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俄國殖民者逐步向哈屯河和阿勒坦河上游推進，將當地土著居民擠向中國邊境地區的縱深地帶。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清朝的積弱充分暴露，俄國於是加快侵略步伐，終於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以後又在此約基礎上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以及中俄《烏里雅蘇台界約》，將唐努烏梁海西北端阿穆哈河一帶地區割歸俄國。

一、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的

簽訂與阿穆哈河地區割歸俄國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在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城的情況下，俄國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北京條約》有俄、漢兩

種文本，漢文本系根據俄文本譯出。該約第二條規定了中國西北地區與俄國邊界的大致走向。

漢文本：「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指齊桑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①」

俄文本：「迄今未經劃定的西部邊界，今後應順山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中國現有卡倫路線而行，即從根據恰克圖條約於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所立最末一個名為沙賓達巴哈的界標起，向西南到齊桑湖，再由此到伊塞克庫里湖以南的山，即騰格里山，或吉爾吉斯阿拉套，亦稱天山南路（天山南脈），又順此山到浩罕領地。②」

該約兩種文本關於唐努烏梁海西部與俄國邊界走向的約文內容存在歧異。漢文本規定從沙賓達巴哈起邊界線「往西直至」齊桑湖，俄文本則規定為「向西南到齊桑湖」。西與西南，直至與斜行，大相徑庭，這一條款自然難以執行。

中俄《北京條約》第三條規定，中俄西界具體勘分由兩國代表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俄國政府指派西伯利亞獨立軍團作業部主任巴布科夫上校和總參謀部大尉戈魯別夫為劃界委員，清政府任命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緒、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為分界委員。

一八六二年八月三日（同治元年七月八日），明誼、明緒等

人和巴布科夫、戈魯別夫等在塔城舉行首次會談。俄方代表從中俄《北京條約》漢文本中抽出「常駐卡倫」四字，從俄文本中抽取一個「線」字，湊在一起，提出一個「常駐卡倫線」的概念，要求以此劃分國界。巴布科夫拿出一張地圖：「內點紅色為限，不論中華邊疆，止以常駐卡倫為界，所有卡外盡作為應給該國之地。」明誼等指出：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至浩罕邊界，「袤延萬里，其中僅有三處地名，系指大數而言，再未詳細指定逐段立界之處」，而且條約內並無只以常駐卡倫為界之語，所以，雙方應先派員查勘未定之界，然後「秉公商辦」。中方代表並向俄方說明：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塔爾巴合台所屬愛古斯勒布什之哈薩克、伊犁所屬特穆爾圖淖爾哈拉塔拉之哈薩克布魯特等，「皆系我國賞給游牧養生之地，並各賞給爵職俸祿，若將其他分隸你國，其人之生計立蹙，又將誰歸，必仍甘心內附，恐與貴國實有不利」。中國代表還傳喚阿爾泰烏梁海散秩大臣巴雅爾莽乃到會作証，並出示標有中國西疆範圍的黃線（「黃限」）的地圖，「指令該使閱看③」。巴布科夫等人說常駐卡倫以西地方早已建立了俄國的城市和村鎮，關於這些地方「沒有談論的餘地④」。當日談判無有任何結果。

從一八六二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十七日，中俄雙方又進行了多次談判。俄方代表堅持以「紅限」為界，中方代表堅持按「黃限」劃界。明誼等指出：約文規定從沙賓達巴哈起的邊界走向是「往西直至」齊桑湖，俄方「欲自沙賓達巴哈往南又轉往東」，明顯與約文不符⑤。「若照你們所議，全以我們常駐卡倫為界，則我們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卡外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王公游牧地方被你們包去，我國斷不能讓」。巴布科夫等始而無言以對，繼言「烏梁海人數眾多」，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是

「公共游牧之地」，「應就地議分⑥」，俄國增派的談判代表札哈羅夫照會明誼等說：中俄《北京條約》只是規定兩國要劃定邊界，並未提及議分邊界少數民族的問題，「唐努、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人等，住牧兩個未分界內，原是公共游牧之地，不能竟據為中國所管之人⑦」。俄方代表態度蠻橫，揚言要以武力強占卡外之地。中方表示願作一些讓步，將輝邊拉胡卡倫至勒布什地方部分領土劃歸俄國，俄方仍堅持原來立場不變，談判毫無進展。

九月二十日，俄方將他們擬定的「國界草案」交給中方，並威脅說：「若不照此辦理，即可毋庸再議⑧」。限十天內答復。明誼等接閱來文，感到事關大局，於三天後向俄方聲明：待請示後答復。十月初，俄方規定的限期已滿，沒有收到中方答復。巴布科夫等人便宣布中止談判，擇期回國。明誼等人希望他們再住數日，以待復文，札哈羅夫回答說：「已經會議十數次，你們不能以常駐卡倫為界，我們不能等候」。中方代表要求商定復會的日期、地點，俄方代表聲稱：「將來議與不議，尙難豫定⑨」。十月十二日，巴布科夫、札哈羅夫等悻悻離去。一八六二年塔城談判中斷。

巴布科夫等離去後不久，明誼照會俄國西西伯利亞總督，申述了中方對《北京條約》有關條款的理解和對俄方國界草案的態度，駁斥了俄方代表對《北京條約》的種種曲解。塔城談判期間及談判中斷以後，清朝總理衙門根據明誼等人報告的情況，曾數十次與俄國駐華公使巴留捷克辯論，指出「統以常駐卡倫為界」觀點之非，指出按照約文，沙賓達巴哈至齊桑湖的邊界走向「係往西而非西南，係直至而非斜行」。巴留捷克或只答應將清政府的照會轉報本國政府，或說此事非其承辦，不明情況⑩，中俄雙

方在北京的交涉也毫無結果。

一八六二年冬和一八六三年春，清政府多次呼籲俄方早日復會，依據條約協商劃定邊界，俄方堅決拒絕無條件恢復談判。

此時正值陝西、甘肅兩省爆發回民起義，新疆局勢不穩。俄國外交大臣遵照沙皇諭旨通知西西伯利亞總督杜加麥利：「盡可能實際上占據符合我國意圖的全部國界線」；對於中方恢復談判的提議，應該這樣回答：只有在中國政府保證按照俄國代表提出的方案解決全部國界問題時，談判才可以恢復^⑪。根據沙皇政府的指令，西西伯利亞當局於一八六三年三月下旬命令俄軍分頭向中國境內推進。四月至六月間，俄軍分幾路侵入塔城、齊桑湖、伊塞克湖、伊犁等地，並炮擊博羅胡吉爾卡倫，製造了打死傷清兵的流血事件。清政府通過各種渠道一再向俄方提出抗議，均無效果。在此情況下，清政府於一八六三年九月初決定全盤接受俄國分界方案，盡快了結劃分西北邊界事宜，並向俄方發出了相應的照會。巴布科夫得知這個消息，於一八六三年十月九日匆匆趕到塔城，要求明誼按俄方擬就的分界方案簽署、交換國界條約。此時清廷訓令尚未送到塔城，明誼沒有答應俄方的要求，巴布科夫等於十月二十五日回國。

十一月初，明誼接到上諭，確知總理衙門已答應按俄國上年所提草案定約，他覺得問題嚴重，遂回奏朝廷，要求繼續與俄方談判，以便盡可能減少損失。清廷擔心稽延時日所失愈多，責令明誼遵照旨意，「將分界事宜，徑行斷結^⑫」。明誼預計到，界約簽訂後，唐努烏梁海西部一些地方會被劃歸俄國，原來游牧于此的中國唐努烏梁海人需要內遷，就發文給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和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要求他們「豫為查出卡內蒙古地方，急將地名咨覆，以便換約後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⑬」。

麟興等核對了唐努烏梁海地圖，發現俄國分界草案中的「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為中國地圖所無，他們不知按照俄國方案劃界，究竟會將唐努烏梁海多大地方劃入俄國。他們認為，克穆齊克旗有十個佐領，三音諾顏部厄魯特貝子旗所屬唐努烏梁海人也有數千，兩項合計，人口達萬餘，游牧地方圓幾百里，倘若克穆齊克河流域被劃入俄境，要在唐努山南三音諾顏、扎薩克圖汗部牧區內安置上述烏梁海人眾，所需地方將會很多，如果僅由烏城派員前往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各旗牧地均經清政府劃定，以皇帝名義賞給各王公住牧，烏城官員前往查勘時，各該旗王公必會「借端推諉，縱使暫為允從，日後難免滋生事端」。據此，他們建議：先由理藩院命令扎薩克圖汗、三音諾顏兩部盟長及各王公舉行會議，商定所讓地方，開清地名，蓋印並附保證書，報送烏城，然後定邊左副將軍衙門再派員前往所報地區查核^⑭。

皇帝命總理衙門對此事提出處理意見。奕訢主持的總理衙門上奏說，雖然俄國劃界方案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不能指實，然唐努烏梁海西部一帶將被俄國割去為「勢所必然」。關予住在這些地方的中國烏梁海人的安置問題，可有以下三個解決辦法：首先，要求俄國讓出數百里地方，安置此項人眾；如前項要求不能實現，即援引中俄東段邊界劃歸俄國之地仍准中國居民留住原地的規定，要求俄方同意：劃界後劃歸俄國之地，「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若俄方仍然不允，即要與俄方商定：被劃歸俄國的烏梁海部落中，有堅心內附者，准其陸續內遷，不得攔阻，並先索憑據，以免日後籍口尋衅。總理衙門對麟興等提出的由三、扎兩部盟長和各王公會商讓地的主張也表示同意，並建議由理藩院向該兩部蒙古王公發出相應的命令。上諭批准按總理衙門的意見辦理^⑮。

一八六四年上半年，明誼多次通知俄國西西伯利亞總督杜加麥利派遣代表前來塔城談判。杜加麥利要求明誼對俄國分界方案「全行應允，毫無更改」^{①⑥}。明誼復照說明，「因議單有與條約不符之處」，所以需要按照條約繼續協商^{①⑦}。杜加麥利來照威脅說：倘中方再不接受俄方要求，俄國政府立即將談判代表「撤回停辦」^{①⑧}。在此前後，俄軍在科布多、塔城、伊犁地區進一步向前推進，俄國邊境當局還遞文給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總管，言稱阿勒坦淖爾、哈屯河及唐努烏梁海阿克穆齊克一帶地方均是俄國土地，「如有人言系中國游牧，拿送俄城」^{①⑨}。此時新疆少數民族反清鬥爭相繼爆發，清朝在新疆的統治岌岌可危。明誼等人只得答應完全按照俄國草案簽訂界約。於是，俄國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羅夫等於一八六四年九月十四日再次來到塔城。十月七日，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簽訂，歷時三年之久的塔城勘界談判結束。

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第一條規定了沙賓達巴哈至齊桑湖的邊界走向：

「自沙賓達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後往南，順薩彥山嶺，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轉往西南，順賽留格木山嶺，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順大阿勒台山嶺；至齊桑淖爾北面之海留圖兩河中間之山，轉往西南，順此山直至齊桑淖爾北邊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轉往東南，沿淖爾，順喀喇額爾齊斯河岸，至瑪呢圖噶圖勒於卡倫為界。此間分別兩國交界，即以水流為憑：向東、向南水流之處，為中國地；向西、向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②①}。

根據此條規定，原自沙賓達巴哈過阿穆哈河與察罕米哈河匯流處，經阿勒坦河與哈屯河匯流處到銓格爾圖喇的中俄邊界線，被向東南推移至薩彥嶺、唐努山、奎屯山到齊桑泊一線。原屬中

國的阿穆哈河、阿勒坦河、哈屯河、察拉斯河、布克圖爾瑪河、那林河流域和阿勒坦淖爾都被劃入俄境。游牧於此的科布多參贊大臣所轄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兩旗和哈薩克族部落都被俄國吞併。

嘉慶年間游牧於阿哈河一帶歸定邊左副將軍直轄的唐努烏梁海十佐領的下落，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余繩武先生主編的《沙俄侵華史》對此事沒有涉及。內蒙古大學等單位編著的《沙俄侵略我國蒙古地區簡史》、西北大學等單位編著的《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都說，這十佐領與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二旗一樣，由於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的簽訂而併入俄國。書中僅僅作出論斷，未作論証^{②②}。中國台灣學者李毓澍先生在其長文《唐努烏梁海佐領考》中則認為：清朝同治年間中俄劃界以後，原來游牧於阿穆哈河一帶的十佐領唐努烏梁海人即自動內徙，「其舊牧地區已喪失於俄，其人民則仍為我有。」李先生對此作了詳細論証，舉出了兩條理由和五條旁証。兩條理由為：1. 清廷當時有意將誠心內附的少數民族部落遷入卡倫之內。2. 此十佐領唐努烏梁海人為定邊左副將軍直屬，清政府會盡可能讓其內徙。五條旁証為：1. 根據《蒙古游牧記》記載，道光年間，克穆齊克旗可能轄四佐領，三音諾顏部厄魯特貝子旗轄十三佐領；而根據《清史稿·藩部列傳》和《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清朝末年，克穆齊克旗轄十佐領，貝子旗轄十七佐領，幾十年間，兩旗佐領數目激增，且增加的總數恰為十佐領，「足証其中有內徙的佐領」。2. 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內徙後又因故遷到界外，一九一七年克穆齊克旗大喇嘛達克丹曾對中國駐烏里雅蘇台佐理專員沉痛申訴，游牧於阿穆哈河一帶的唐努烏梁海十佐領與克穆齊克旗同隸定邊左副將軍，倘淪為俄屬，達克丹必更憤慨，而他卻對此隻字未提，「正可反証其仍居中國境內」。3. 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內徙兩三年後又

遷界外，主要原因在於徙牧之科布多河地區人口稠密，生活艱難，各部雜處，時有爭執；阿穆哈河十佐領徙於地廣人稀的唐努烏梁海盆地，不會發生類似問題。4. 克穆齊克旗道光至光緒間人口超乎正常的激增，「當與阿穆哈河十佐領內徙有關」。5. 一九〇九年，克穆齊克旗總管海都布病逝，定邊左副將軍奏請任命海都布長子布音巴達爾琥為總管，奏折中說明，布音巴達爾琥系由本旗十佐領「公揀」，「特表明公揀者，即重視此內徙佐領的意見」^②。

筆者認為，《沙俄侵略我國蒙古地區簡史》和《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的阿穆哈河十佐領「被俄吞並說」無有証據，難以憑信。李毓澍先生的「內徙說」較有道理。李先生多方搜求旁証，推進了對此問題的研究，功不可沒。然其論據尚須充實，有些論據並不可靠，需要訂正，而其論點也不是全部正確，有待予以完善。

清廷當時確曾有意將誠心內附之唐努烏梁海人內遷，但這只是起初的一個設想，後來是否付諸實行還是一個問題，所以兩條理由尚不能証明內遷之事。五條旁証中有些不能成立。《蒙古游牧記》與早於它的嘉慶《大清會典圖》是有記載，噶哈爾河源有定邊左副將軍所轄四佐領，然此四佐領可能是薩拉吉克旗之佐領，克穆齊克旗在《勘分西北界約記》簽訂之前即有十個佐領^③，並不存在同治年間中俄劃界後佐領數目激增的問題。關於三音諾顏部厄魯特貝子旗所屬唐努烏梁海佐領數目，嘉慶《大清會典圖》記為十三，《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記為十七，兩者差別很大。清末十七佐領是確鑿無疑的，至於幾十年間佐領數目為何激增，確實是個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定邊左副將軍直轄的佐領不會因遷移牧場而改變隸屬關係，也許貝子旗所屬烏梁海人本來就

是十七佐領，只是嘉慶《大清會典圖》記載有誤罷了。因此第一條旁証存在問題。克穆齊克旗光緒年間人口幾達萬人，《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等有明確記載，自為事實，但道光年間人口數字按四佐領推出為三四千人則無根據，故第四條旁証亦屬虛假，前章已經說明，本旗推荐是清代唐努烏梁海總管產生的第一道程序，所以第五條旁証亦無效力。五條旁証，惟有第二、第三兩條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尤其第二條旁証相當有力。

李先生認為阿穆哈河十佐領遷入了唐努烏梁海盆地，這是正確的，但他認為遷入時間在同治年間中俄劃界之後，則值得商榷。筆者認為，阿穆哈河十佐領在同治年間中俄劃界之前已經遷入了克穆齊克河一帶。

阿穆哈河十佐領就是克穆齊克旗所屬的十佐領。從乾隆年間到宣統年間，定邊左副將軍所直轄的佐領基本沒有變化。佐領為行政建制，具有穩定性，不會無緣無故地隨便增減。從乾隆年間到清朝末年，唐努烏梁海未發生大的事件，整個的旗佐建制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定邊左副將軍直轄的佐領也是如此。按照規定，標準的佐領每佐為一五〇戶，根據具體情況，可以不足此數，也可超過此額。乾隆年間編設佐領時，唐努、薩拉吉克、托錦、庫蘇古爾四旗每佐的平均人口只有三〇〇名左右，並不足額。此後一〇〇年左右的時間裏，各佐領人口會有增加，但沒有必要因此而增編佐領。現有史料也表明，唐努、薩拉吉克、托錦、庫蘇古爾四旗自乾隆年間編成十六佐領以後，迄清末一直沒有改變^④。定邊左副將軍直轄的另外十佐領與唐努等四旗的十六佐領事同一律。因而，嘉慶年間歸定邊左副將軍直轄的十佐領，自然也應是清末歸定邊左副將軍直轄的十佐領。克穆齊克旗從一七六四年到一九一一年始終由定邊左副將軍直接管轄，該旗在中俄《勘分西

北界約記》簽訂以前和清朝末年均爲十佐領，所以，嘉慶年間所謂的阿穆哈河十佐領即克穆齊克旗所屬的十佐領無疑。

同治年間中俄劃界時克穆齊克旗十佐領不在阿穆哈河一帶，而在克穆齊克河流域游牧。當時該旗游牧區的西部邊緣在唐努山的察布齊大壩一帶。一八六九年建立界牌時，克穆齊克河西岸山區有些地方被俄國占去，但這些地方面積不大，且「系曠野荒山」，克穆齊克旗總管巴札雅親自參加了建立界牌的工作，他在當時以及事後都說此次立界未使克旗現在的游牧地遭受多大損失②。

塔城談判期間，清政府及其談判代表對唐努烏梁海西部邊界情況和各旗的特地範圍並不清楚③。他們只是大概估計唐努烏梁海西部地區可能被劃入俄國，根據這種估計，他們籌商了安置將來可能需要內遷的唐努烏梁海人戶的問題。後來，清政府派人前往唐努烏梁海進行實地調查，又向各旗總管索取地圖，經過調查了解，清政府弄明白了此時克穆齊克旗和三音諾顏部厄魯特貝子旗所屬烏梁海人游牧區的西部邊緣在薩彥嶺、唐努山一帶④，此後不再提說安置唐努烏梁海人眾之事。

阿穆哈河十佐領即克穆齊克旗十佐領爲何於同治年間中俄劃界之前就離開了阿穆哈河地區？主要原因可能是俄國勢力的逼壓排擠。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俄國殖民者不斷向哈屯河和阿勒坦河上游推進。既然強鄰逼壓，原地游牧難以繼續，身後的唐努烏梁海盆地地廣人稀，十佐領烏梁海人自然而然地就會向這一帶遷移。這個遷移過程在嘉慶時期可能尚未發生，故嘉慶《大清會典圖》將十佐領的牧地標於阿勒坦河、阿穆河之間，但它肯定發生在同治年間中俄劃界之前，而不是在這之後。

二、唐努烏梁海西境中俄界牌的

建立與《烏里雅蘇台界約》的簽訂

中俄《勘分西北界約紀》第六條規定，自該約互換之日起過二四〇天，兩國勘界大臣在阿魯沁達蘭、喀布塔蓋兩卡倫中間地方會齊，分爲西南方向和東北方向兩起，按照議定的邊界走向建立界牌鄂博。由於新疆維吾爾等族反清鬥爭的爆發，伊犁、塔爾巴哈台地區陷入戰亂，西南一路建立界牌鄂博的工作已不可能進行。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地區局勢比較穩定，清政府仍然積極準備依約立界。清廷指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負責烏城屬境的立界事宜。麟興於一八六五年六月（同治四年五月）專程前往科布多，守候兩月之久，不見俄使到來信息。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四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俄方派人到索果克卡倫通知說：俄國「固畢爾那托爾（即武官省長）現帶兵起程西行（指侵略浩罕——引者），本年不能會同辦理⑤」。麟興遂於九月中旬（七月下旬）經索果克前往唐努烏梁海西境實地勘查邊界。九月二十二日（八月初三日），麟興行抵唐努烏梁海西南邊界的奇格爾蘇台（齊格木爾素台）卡倫，署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印務總管瓦齊爾呈報：唐努烏梁海境內「現已落雪，山壩實難行走，烏拉一切，不能運到設台處所」。麟興遂返回烏城⑥。

俄國以攻打浩罕爲由拖延派人前來勘界立牌，同時卻派兵驅趕科布多西境中國守卡官兵，強占沿邊土地。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夏，和尼邁拉虎、納林、冒吉斯台等八卡的中國官兵全部被驅逐至烏克卡倫以東⑦。

清政府鑒於俄國「乘亂一味占據邊疆」，於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同治六年十月）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奎冒照會俄國塞米巴拉金

斯克省省長巴布科夫，要求迅速派員前來依約設置界牌。一八六八年六月（同治七年閏四月），清政府重新指定了立界代表，委派榮全、奎昌分別負責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地方建立界牌事宜^{③①}。同年七月初（五月中旬），俄國駐華公使照會清朝總理衙門，「內稱建立界牌鄂博一事，現接伊國京都來文，以俄國附近新疆有賊處所，不能悉照塔城條約，處處立牌」，建議「於安靜地方，先行建設^{③②}」。清廷急忙催令榮全由烏里雅蘇台前往科布多與奎昌一起辦理烏、科屬境立界事務。榮全在科城候至十月底（同治七年九月中旬），仍無俄國代表消息，遂又向巴布科夫發去一件照會，要求訂准明年勘界時日，「確切示知」，然後返回烏任^{③③}。清朝總理衙門再次與俄國公使交涉。同年十二月（同治七年十一月），雙方議定：次年五月二十二日（四月十一日），兩國代表在烏克卡倫齊集，「從北方當時處於中國武裝叛亂分子行動範圍之外的地方開始」建立界牌^{③④}。

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日（同治八年四月初九日），榮全、奎昌等到達烏克。六月八日和九日（四月二十八、九兩日），俄方勘界全權代表巴布科夫、幫辦穆羅姆佐夫（舊譯穆魯木策傅）、中校翻譯官巴甫林諾夫（舊譯龐齡、巴巴勒爾傅）帶領步兵和哥薩克各一連組成的衛隊陸續來到。六月十三日（五月初四日），榮全、奎昌與巴布科夫等舉行會議，根據俄方提議決定：雙方立界人員分為兩組，一組向西南，負責勘定賽留格木嶺至瑪尼圖噶圖勒干卡倫之間即科布多地區南段的邊界。一組向北，先由奎昌會同穆羅姆佐夫設置科布多地區北段界牌，然後榮全與穆羅姆佐夫一起繼續往北，樹立烏里雅蘇台地區的界牌，直到沙賓達巴哈界牌為止。

六月二十五日（五月十六日），榮全到達烏里雅蘇台、科布

多屬境交界處。七月二日（五月二十三日），穆羅姆佐夫與奎昌一同到達。三人商議建立科城最末亦即烏城第一個界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規定此段邊界「順賽留格木山嶺」而行，簽約時雙方互換的分界地圖上用紅線標出了此段邊界的具體走向。穆羅姆佐夫抓住原約第六條「建立界牌鄂博時，總以各界址處所水流之方向作為立界之憑，擇其地方形勢建立」一般文字，要求必須按水源劃界，聲稱：「此地雖係賽留格木，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須再行找尋，方可建立牌博」。榮全指出：「原圖既有紅線，原約又有條款，應當順此山嶺，方為平允」。穆羅姆佐夫說：「紅線、條約可不必遵，止以水源為主」。經過三天辯議，雙方才達成了協議。七月五日（五月二十六日），三人順賽留格木嶺來至唐努烏梁海西南邊界盡處的博果蘇克（柏郭蘇克）大壩（此壩屬賽留格木山脈）。次日，榮全、奎昌與穆羅姆佐夫於壩上分別建立界牌鄂博：烏里雅蘇台牌博立於北，科布多牌博立於南、俄國鄂博堆於西，「勢如鼎足」。奎昌隨後南返。

榮全、穆羅姆佐夫在博果蘇克住了一日。雙方「各畫草圖」，標明山之西北為俄國地，山之東南為中國地。由博果蘇克壩向東北方向，山下為中國唐努烏梁海人行走之路，約六十里，有一七名塔斯啓勒山。七月八日（五月二十九日），勘界隊伍來至此山，在山頂上堆立了第二座牌博。當日勘界隊伍行至珠噶淖爾附近宿營。

在商議下一段界牌的設置地點時，雙方發生了爭議。按照中俄雙方互換的分界地圖，從珠魯淖爾往前的邊界線應該是：「順淖既多，又每有大水阻路」，比較難走，然而中方事先已經派人「探修路徑」。穆羅姆佐夫卻借口道路難行提議將邊界線移向分界紅線東邊中國境內。他說：「若由紅線，其路萬難飛越，止就

珠噶淖爾迤北數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齊壩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繞至沙賓達巴哈，路既便捷，又易行走」。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所附分界地圖規定的這段邊界線的走向是：先向西，再向北，再向東至沙賓達巴哈。穆羅姆佐夫提議的邊界線走向卻是：由珠噶淖爾直向西北，繞至沙賓達巴哈。按他的主張行事，察布齊大壩以西唐努山西端一帶依據《勘分西北界約記》當屬中國的地區就會被劃入俄國。這分明是想越過《勘分西北界約記》，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榮全明知「若照該俄官所議，不惟與原圖大不相同，且將唐努烏梁海游牧包去大半」，但由於畏難苟安，並未據理力爭。他在給清政府的報告中說：「立界一事，數年以來，迄未就緒。此次準備台站，費盡心力，始立牌博兩處，若遽決裂，以後更難辦理」。以此為理由，他主張：「倘紅線所定曲折之處，實不能行，向內繞道，祇於蒙古等生計尚無妨礙，亦可稍讓隙地，令彼得益而止，或可迅為藏事」。榮全報告說，他已令隨同立界的唐努烏梁海總管等「妥為籌議，如無窒礙，即行從權辦理」^⑤。清廷於八月三日（六月二十六日）收到榮全的奏折，皇帝諭軍機大臣等說：「該俄官借詞欺蒙，意圖侵越，豈可遂其狡謀。榮全惟當按照條約，與之辯論，固不可過於決裂，致生事端，亦不得借口從權，遷就了事，任令得步進步，貽誤事機」。這個上諭只說了些抽象籠統的空話，雖然清廷將它作為急件以每日六百里的速度送往邊界，但上諭發出時榮全已經結束全部界牌的設置正在返回途中，該上諭當然不會起任何作用^⑥。

七月十三日（六月初五日），榮全與穆羅姆佐夫在珠噶淖爾東南約十數里哈爾噶小山上設置了第三座牌博，又在珠噶淖爾北岸、唐努山南約二十里之察布雅齊壩上建立了第四座牌博。十四日，榮全偕同穆羅姆佐夫從珠噶淖爾北岸、唐努山南出發，向西

稍走了一小段路，到達珠噶淖爾末處，轉而向北，又轉向東，約行二五〇畢里，到達庫色爾壩上。「此地已接唐努烏梁海向西偏北極邊地方，於此壩上，同立第五座牌博」。榮全與俄方劃定的這一段邊界線基本上是穆羅姆佐夫主所主張的邊界線。在事後給朝廷的奏報中，榮全為自己辯護說，隨同立界的唐努烏梁海總管等稟稱：由珠噶淖爾北岸「順唐努山南向西行走，止有兩三站路可通，再向前行，險山大水，實不能越，向內繞道無多。雖係唐努烏梁海邊境，幸係曠野荒山，此等隙地，盡可稍讓，與游並無妨礙」。

由庫色爾壩向西「無路可通」。於是勘界隊伍下得壩來，「向東北入唐努烏梁海邊境，約行一站半路」，折而向北，「約共行三百餘里」，七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三日），「行抵唐努鄂拉達巴哈末處迤西山下」。此處有一條流向西方的楚拉察河。二十三日（十五日），雙方在楚拉察河水流之處同立第六座牌博。該牌博「東南系唐努烏梁海邊境，其西北為俄國地」^⑦。

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日），勘界隊伍由楚拉察河啓行，先向北，轉折向東，順哈喇淖爾北邊的薩彥嶺行走。二十七日（十九日），來到蘇爾壩上，建立了第七座牌博。穆羅姆佐夫要求就此結束設置界牌的工作，言稱：「由此壩前進，直至沙賓達巴哈山脈一線相連，其中並無曲折。該處舊有兩國牌博，已與此壩相接」。「此處立界已完，我定於二十二日（七月三十日）旋回，請照原議趕緊繪圖作記」。榮全要求穆羅姆佐夫同至沙賓達巴哈添立牌博，遭到拒絕。榮全遂派主事職銜阿克棟阿、即補驍騎校青山等前往沙賓達巴哈設置界牌，同時督率隨從繪出分界地圖，寫出記約，簽字蓋印，於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一日）送交俄方。穆羅姆佐夫「亦將繪出俄圖送閱」，榮全在俄方繪制的分界地圖上

注明新立八處牌博地名，簽字蓋印，交穆羅姆佐夫轉送巴布科夫用印簽字^⑳。七月三十日，穆羅姆佐夫經楚拉察河入俄境南下。八月七日（六月三十日），榮全一行返抵唐努烏梁海西南部的烏蘇胡吉爾地方。

阿克棟阿、青山等於七月三十日抵達沙賓達巴哈山頂。此處舊有中國牌博一處，「此山東北，舊有俄國分界木椿一根，並有鄂博三處」。阿克棟阿等於中國舊牌博之東山頂上新立牌博一處，然後返回^㉑。

榮全於八月二十三日（七月十六日）回至索果克卡倫。九月二日（七月二十六日），巴布科夫派人前來通知說：榮全交給穆羅姆佐夫的滿文立界記約「稍有未合」，俄方已代中方另擬了一份滿文記約稿，「請照抄四分，仍交來差帶回，伊再會印畫押」。榮全發現巴布科夫所擬滿文記約稿將中方原擬「記約內所開里數方向、木石形勢概以刪減」，也未進行交涉，即將俄方所擬滿文記約稿照抄四分，蓋印簽字，「交原來俄官帶回^㉒。一八七〇年初（同治九年），俄國駐庫倫領事將「應換交烏里雅蘇台會印押界址全圖一分，俄字約四本」送交中國^㉓。唐努烏梁海西境的中俄劃界工作就此結束。

中俄《烏里雅蘇台界約》是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的發展和具體化。它進一步確認了俄國對唐努烏梁海西北端阿穆爾河地區的侵占。同時，這一界約的簽訂標誌著中國唐努烏梁海地區與俄國邊界的完全劃定，它再一次確認沙賓達巴哈至博果蘇克一線以東的唐努烏梁海盆地為中國領土，這對以後俄國向這一地區的擴張具有限制作用。

三、勘分西界過程中唐努烏梁海人對祖國的貢獻

在十九世紀六〇年代西疆劃界過程中，唐努烏梁海人遵照清政府的命令，做了不少工作。

1. 嚴守邊界，監視俄人動向，阻止俄人私立界牌鄂博。

塔城談判開始前後，沙皇俄國採取了「武裝占領國界」的侵略行動，出動軍隊侵入伊犁、塔城地區，在預定要侵占的中國領土上擅立分界標誌，企圖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國承認。清政府急令西北沿邊各地嚴加防範。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一日（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八日），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麟興派遣額外驍騎校福連等人趕往唐努烏梁海，「詳細面諭副都統職銜拉瑪扎布，飛速嚴飭總管，督率官兵，不動聲色在於各界牌地方，常川嚴密稽查，如有俄人運料興工，必須善為開導，令其聽候兩國分界大臣議定換約後，始准據圖建立界址，毋致滋事^㉔」。由於俄國強欲統以常駐卡倫為界，中方不允，塔城談判於一八六二年十月中斷。清廷估計俄人「此次既解望而去，將來復行議界，即難保不帶兵豫占地方，以為強詞奪理地步」，遂命西北四城將軍、大臣採取預防措施。上諭專門提出要發揮唐努烏梁海等邊疆少數民族的作用：「唐努烏梁海蒙古等部落及哈薩克等各游牧，聞明誼等議界未將該處分給俄國，無不感激歡欣，誓志效順，其人實屬可用，即著該將軍、大臣等隨時鼓舞激勵，作其同心御侮之氣，以固藩籬^㉕」。次年三月（同治二年二月）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飭唐努烏梁海各總管：倘俄人來至唐努烏梁海運料興工，私建鄂博，必須盡力阻止，「一不得供其烏拉，聽其驅使；再不可貪其利物，被其搖惑。節節抵禦，嚴密防維，既使無隙可乘，又使無詞可藉」。並且要隨時偵察，如果得到俄軍準備侵犯的情報，一定要立即呈送烏里雅蘇台^㉖。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春夏，俄國在西

北沿邊加緊武裝挑畔，以打逼談。明誼等於同年夏面諭前來烏城交納貂皮的唐努烏梁海各旗總管：「現當分界未定，譏察防閑，尤其緊要」。各總管一齊表示：「世受國恩，理宜報效，謹遵所諭，轉示各屬，一體遵照，實力奉行^{④5}」。麟興還擬飭令三音諾顏部厄魯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前往本管烏梁海暫住，會同唐努烏梁海總管軍都布，「出派通曉俄國語言者，前赴沙賓達巴哈界牌一帶，凡與俄人可通往之處，常川駐守，不時偵探，倘有俄夷越界窺伺，一面詳細呈報，一面善為阻止」。麟興又行文庫倫辦事大臣，請他速派委員組織達爾哈特人加強防範^{④6}。

由於國力衰弱和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塔城談判的最後結局，對中國來說，仍是一個屈辱的敗局，然而唐努烏梁海官民捍衛祖國疆土的業績不可磨滅。

2. 協助勘查界址，參與設置分界牌博，為分界大臣提供烏拉台站。

一八六二年塔城談判開始之前，明誼認為中俄《北京條約》第二條內容含混不清，從沙賓達巴哈至浩罕邊界表延萬里，約中僅有沙賓達巴哈、齊桑湖、特穆爾圖淖爾三處地名，「若不遍查確勘，猝難與之會議」。清政府根據明誼奏請，命令西北沿邊各地將軍大臣添派委員，「各按本境周查」，核實輿圖，以便談判時有所依據。明誼估計：將來的邊界線「必與唐努烏梁海、吐爾扈特、杜爾伯特等處蒙部落毗連，道路既運，又險阻難行，若派人往查，必須添派烏、科二城章京，並蒙古官員數人，會同前往，方可有濟」。遂與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平瑞協商，添派烏里雅蘇台部缺筆帖式兵嵩武、三音諾顏部副盟長固山貝子察克都爾扎勒（貝子旗唐努烏梁海人歸其管轄），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總管拉瑪札布為烏城查界委員，與科布多所派官員同時行動，分頭查

勘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處的中俄邊界^{④7}。

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夏，清政府因俄國分界「議單」內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等地名難以確定，曾令唐努烏梁海總管繪成各旗游牧圖志，送給明誼參考^{④8}。

根據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建立界牌的工作原定一八六五年五月（同治四年四月）開始，麟興負責設置唐努烏梁海西境的中俄界牌。此時拉瑪札布已經逝世，麟興於一八六五年初（同治四年正月）割飭護理唐努烏梁海印務總管興達遜，要他「遵照分界大臣議定界址地名，查明經由路程呈報，並將應需烏拉駝馬等項妥為豫備^{④9}」。興達遜向麟興遞交了報告，說明了唐努烏梁海西部的中俄分界地點，其中指明：「唐努烏梁海游牧西南邊界，係在齊格木爾素台卡倫後邊，自博果素克大壩迤北，才至該游牧西界^{⑤0}」。

一八六五年五月九日（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岳嵩武到達唐努烏梁海西南邊境努克穆河地方，準備與興達遜會勘界址。此時興達遜突然病故。麟興急令克穆齊克旗總管瓦齊爾督率當地官兵，與岳嵩武「會勘應立界牌處所，迅速呈報^{⑤1}」。岳嵩武馳抵唐努烏梁海西南邊境烏蘇胡吉爾地方，與瓦齊爾會晤。隨後，兩人率領熟悉邊界之唐努烏梁海官員，「攜帶烏拉」，於七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五日）馳赴博果素克大壩，從此處起「沿站按圖詳查」。他們到達了唐努山西端的唐努鄂呢音達巴哈，「核與俄圖所劃唐努鄂拉達巴哈西邊末處界限相符」，遂將「立界處所擬注圖內請核」。他們又來到了阿克額克依大壩迤北，發現此地「崇山峻嶺，阻隔難行」，於是「步履繞爬山頂觀看」。瓦齊爾等遙指沙賓達巴哈相距咫尺，並指稱沙賓達巴哈迤南之薩拉塔斯台噶山，即系俄夷圖內所載之薩彥山。瓦齊爾派遣手下的昆都、

德木齊等官員探明：「由阿克額克依大壩繞越阿勒坦淖爾邊境之慶柯爾赤樓大壩一站，余路即向東北赴入本唐努邊境之哈喇淖爾，可至沙賓達巴哈，路徑顯然，庶無窒塞」。岳嵩武繪成地圖一張，圖內注明了珠噶淖爾、塔斯啓勒山、哈喇塔蘇爾海山、德布色克台噶山數處地名，經瓦齊爾等「呈具加結」后報送麟興，轉送總理衙門以及明誼。同年九月二十二日，麟興因下雪道路難行，從查勘唐努烏梁海邊境的路上折回，臨行前命署理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印務總管瓦齊爾：「將應勘界址，俟來春積雪消化，即就近再行詳細覆查，以憑查核^{⑤③}」。

一八六八年九月十二日（同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榮全奏稱：榮全已在進行勘界準備，已密飭唐努烏梁海五旗總管等慎加防範，派熟悉地理官兵十員名，在各游牧聽候立界時按圖考詢山河地名，以便指陳堆博立界，而杜朦混^{⑤④}。

在一八六九年設置唐努烏梁海西境中俄分界牌博過程中，唐努烏梁海副都統銜掌印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克穆齊克旗總管巴札雅作爲分界大臣榮全的隨員，自始至終參與了建立界牌的工作。此次立界時當七—八月份，按照慣例每年此時唐努烏梁海各旗總管應該率屬前往烏里雅蘇台城交納貂皮。爲了不影響立界事務，榮全奏請皇帝批准：俟界務完竣再令這兩名總管趕赴烏垣交貢。三音諾顏部厄魯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派遣官員帶領貝子旗唐努烏梁海人隨同立界。據榮全事後奏報，唐努烏梁海官員「隨時指陳路徑，條分縷析^{⑤⑤}」。榮全在設置每個界牌時都征求了他們的意見，「凡立牌博，必諭令唐努烏梁海蒙官等眾隨同查看有無侵越^{⑤⑥}」。

唐努烏梁海無有額設台站，清朝勘界官員及其隨從所需駝馬

、房間、食羊等項全部是由邊界線附近的唐努旗、克穆齊克旗、三音諾顏部厄魯特貝子旗烏梁海人「攤派而來」。「供應一切，頗爲浩繁」。此次立界地區「險山大水，林壑崎嶇」，人煙稀少，運輸困難。因此，承擔這些後勤供應工作，對於貧困落後的唐努烏梁海人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然而，在勘界大臣作了開導教育之後，唐努烏梁海人對備辦烏拉房間羊隻等項「均皆樂從，踴躍爭先」，「實屬恭順可嘉」。清朝當局對作出貢獻的唐努烏梁海官員幾次予以獎勵。一八六九年五月（同治八年四月），「通曉地利、素能辦事」的唐努烏梁海官員達木底音、扣肯、桑吉札布、索特巴奉命調集駝馬，在烏蘇胡吉爾地方等候立界，榮全當即賞給煙茶並且賞給他們三品頂戴，朝廷覽奏即予照准。博果素克、塔斯啓勒兩座牌博立竣之後，榮全立即上奏爲鄂勒哲依瓦齊爾等唐努烏梁海官員請獎並獲批准。全部界牌設置完畢之後，清廷根據榮全奏請，再次對表現突出的唐努烏梁海官員予以獎勵。榮全立界完畢返至烏蘇胡吉爾地方以後，還「於隨帶立界經費銀兩內提出銀一百五十兩，分給該三處各五十兩」，以示獎恤^{⑤⑦}。

註釋：

①：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一九五七年三聯書店出版，第一冊，第一五〇頁。

②：《中俄邊界條約集》（俄文漢譯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出版，第三十三頁。

③：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第九卷，第三十五—三十六頁。

④：（俄）巴布科夫：《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王之相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出版，上

冊，第二二二頁。

- ⑤：同治朝《始末》，第十七卷，第四十六頁。
- ⑥：同治朝《始末》，第十卷，第十一頁。
- ⑦：同治朝《始末》，第十卷，第五十二—五十三頁。
- ⑧：同治朝《始末》，第十卷，第十二頁。
- ⑨：同治朝《始末》，第十卷，第五十三頁。
- ⑩：同治朝《始末》，第十一卷，第二—四頁，第八頁。
- ⑪：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譯：《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上冊，第二五九頁。
- ⑫：同治朝《始末》，第二十二卷，第三十四頁。
- ⑬：同治朝《始末》，第二十三卷，第一頁。
- ⑭：同治朝《始末》，第二十三卷，第一—四頁。
- ⑮：同治朝《始末》，第二十三卷，第六—十二頁。
- ⑯：同治朝《始末》，第二十四卷，第二頁。
- ⑰：同治朝《始末》，第二十七卷，第三十三—三十四頁。
- ⑱：同治朝《始末》，第二十六卷，第十一—十二頁；第二十七卷，第三十三頁。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譯：《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上冊，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 ⑲：同治朝《始末》，第二十七卷，第一—二頁。
- ⑳：王鐵崖：《中外舊約章江編》，第一冊，第二一五頁。
- ㉑：編寫組著：《沙俄侵略我國蒙古地區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九十二頁；編寫組著：《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一九二頁。
- ㉒：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一九七八年再版，第二三二—二三六頁。

- 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史館」）藏：宮中全宗，民族類，蒙古項，第三九九卷，一號。同治朝《始末》，第二十三卷，第三頁。
- 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一九五九年台北出版，第一一二頁。
- ㉕：同治朝《始末》，第六十七卷，第五頁。一史館藏：宮中全宗，民族類，蒙古項，第三九九卷，第五號。
- ㉖：同治朝《始末》，第二卷，第三十六—三十七頁；第五卷，第五十二—五十三頁；第二十八卷，第四十六—四十七頁。一史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外交類，中俄關係項，第五〇八卷，第二號。
- ㉗：一史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外交類，第五〇卷，三號，第五〇卷，一號。
- ㉘：同治朝《始末》，第三十五卷，第八頁。
- ㉙：同治朝《始末》，第三十六卷，第九—十頁。
- ㉚：同治朝《始末》，第六十一卷，第二十一—二十一頁。
- ㉛：榮全此時任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 ㉜：同治朝《始末》，第六十卷，第三十八—三十九頁。
- ㉝：同治朝《始末》，第六十二卷，第十五—十七頁。
- ㉞：同治朝《始末》，第六十二卷，第二十八頁。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譯：《一八五九—一八七五年我在西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下冊，第三八三頁。
- ㉟：同治朝《始末》，第六十六卷，第十四—十六頁。
- ㊱：同治朝《始末》，第六十六卷，第十八頁。一史館藏：廷寄類，第三四七號文件。

（文轉30頁）

成吉思汗傳（拾伍）（待續）

原著人 仁沁哈拉達巴
譯者 恩和塞汗

第二篇

第十一章 蒙古軍的遠征歐羅巴

成吉思汗死後、規定以二年期限為其服喪期間。這個期限終了的一二二九年，臨時執政者，就是由先帝末子拖雷，為了選舉新皇帝及審議各種國政問題召集了國會。國會遵從先帝的意志，確認了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為大皇帝。窩闊台倣效成吉思汗之前例，拒絕於四十日之內即帝位，拖雷和高位的公候，軍指揮官，以及與貴族們共同說服他時，始允諾即行繼位。於新帝王面前第一個行三拜九叩禮的乃是其次兄察哈台。這是他們賢人耶律楚材，為給別人看的，他說服了察哈台而實施者。

於成吉思汗死後，最初的兩個年在臨時政府領導下在極平穩的狀態下過去了。又窩闊台登極也沒有任何內訌或動搖之事情發生，由此可証明蒙古帝國的偉大創立者或立法者成吉思汗所制定的行政制度，其基礎為何等堅固而且又多麼的嚴格。

成吉思汗把上面的諸王子置於一傍而選擇窩闊台為後繼者之事，雖然與過去的蒙古風習不大吻合，但是這個完全收到了所預期的效果。窩闊台在其智力上、性格上，甚至於其統轄能力上都勝於自己的兄長們，又於其短期的在位中，所表現的就是在歷代皇帝中也是一個最有人道性，最有啓蒙性的王者。

成吉思汗所遺留下來的這個巨大國家，已經於其在世期間，分割了四塊領有地。這是由正夫人孛兒帖所親生四個兒子的數字來所決定者。這就是求赤佔有從阿爾泰到烏拉爾為止的西北方，這個地方很廣闊，南方到阿木達里崖及阿拉爾海為止。察哈台的領地是從阿木達里崖的南方——土耳其斯坦一部，阿富汗、波斯，以及後高加索。窩闊台掌握有蒙古本土的西部全部，此外又掌管了準噶爾和東部土耳其斯坦。最後再說拖雷據有的領地是奈曼種族所有地，蒙古本土的東部，唐古特種族的領有地，以及從金帝國所佔領的地區。彼等王子們，如同皇帝以下副王之似的權利，曾治理其領有地。

近於成吉思汗死亡時期之蒙古軍的兵數曾為十三萬九千人，依成吉思汗的遺訓，其中十萬一千人歸於拖雷統率。此中包含有撒干所統率的近衛隊「千勇士」。撒干係為唐古特種族出身，十五歲時被成吉思汗所捕虜，和由孛兒帖夫人所生的孩子們一同養育成人者。成吉思汗與他附以「第五王子」之名的原因所在。拖雷所屬的軍隊中還有帖爾別，歐伊拉圖種族所編成的四千人軍隊，曾屬於胡圖嘎指揮下。胡圖嘎這個人為蒙古帝國所盡的功績實在是不在少數，因此付與了胡圖嘎由他自己之手任命到千人頭為止的所有別刻（長官、指揮官）權限。（註一）

千戶長（原文有誤——譯者註）遴選的守陵人不參加戰爭，這是由成吉思汗的遺訓，專門守護供祭其遺物的布爾罕卡爾山一帶的大禁區。

其餘二萬八千人全部委由其他王子們管轄，其中，求赤分到

了四千人的兵和九千個帳幕，並任命他為三人的指者。於為此當中，到了後來據歷史學家喇失惕額丁說法，其中參加了很多被求赤所統一的俄羅斯人、卻爾凱斯人、欽察人（即犬戎——譯者註）、瑪加拉人等。（摘自別利金著書）

以成吉思汗後裔之立場當可達成之三個重要問題在庫爾台（國會）審議通過了。第一為要完成平定北中國之事。第二是從印度出發獲得東部伊朗的一部份，要滅亡掉正在貪想波斯王位的突拉爾埃斯欽（默罕默德王的兒子）之事，第三是派遣遠征軍指向歐洲。

在中國的蒙古人狀況，到這個時候為止曾不大好。木訶里死後，他們蒙古人，把成吉思汗所獲得的大部分地區都丟掉了。對中國遠征軍之新的指揮者是窩闊台汗本身。彼將具有才氣的弟弟拖雷，以及已經老去並且富於經驗的父親戰友哲別置於身傍，向著這個壯途出發了。金軍嚐到了無數的敗北滋味，雖然如此仍尚繼續固執的守護其城塞。但是，蒙古軍仍然遵守著在成吉思汗生前所指示過的，保持著與宋國之同盟關係，勝利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到一二三五年滿洲人勢力衰退，金帝國大部分歸於蒙古帝國版圖，將很少的部分讓給了同盟國的宋。

當與突拉爾埃斯欽戰爭開始時期，和金之間的戰爭已傾向於對蒙古軍有利時機了。此項軍事係委由卻麻根將軍來指揮，他沒有費特別的苦心，把到這個時候為止的蒙古軍所喪失的土地很成功的都重新收回來了。突拉爾埃斯欽一敗塗地的跑到庫吾爾道人下面去了，最後在那兒被殺。後來，蒙古軍向北印度斯坦發展其勢力，在其征服行程所向之處攝於蒙古人的雄姿，因而那兒的德里市也俯首確定呼稱所謂「大蒙古」朝之說。

阿塞爾伯京、庫爾吉斯坦、後高加索、阿那陶里亞之一部也

完全被納入了蒙古帝國組織之內。因此，也漸漸進入了第三課題階段，準備著手征服歐羅巴的時機已經來到。

向東歐遠征之說事，經於一二二二年及一二二三年之遠征後所決定者，並且預定從歐洲獲得的土地使之成為求赤的領域。求赤死後，這個地區決定歸其兒子拔都支配。所以，遠征東歐的主要任務落在拔都雙肩之上。除拔都之外，從成吉思汗家參加此一行的人是，拔都的叔伯兄弟即窩闊台的兒子古由克，同拖雷的兒子蒙哥，以及察哈台的兒子巴嘎圖爾和卡且與其他。拔都即於類似總司令官位置，任命速不台為輔佐官。因速不台曾一度曾涉足於東歐的關係，很熟悉該地情況。以上一切事宜，於一二三五年征討金國終了之後的國會所決定者。越發的迫近開始遠征日期為止，以二年的期限經詳細作了各項戰鬥準備。

可能來臨的威脅，比什麼都首先侵襲到自己頭上的事一點也沒有考慮到的俄羅斯諸公，仍舊繼續在開內訌中，蒙古軍早就已經很瞭解了那種事。聖烏拉吉米爾的後繼者們，在喀爾喀所嚐到的恐怖教訓，忘得太快了。

由速不台一手培植成功的蒙古軍偵察網。這不僅限於最近的目的物東歐，他把手早已伸展到遠方的西歐了。這就是速不台經過凡尼斯人的手對歐羅巴各式各樣的社會階層已有了相當的認識，據邊緣線上校著書之說法，就是連教皇也以速不台來說不是什麼機緣太遠的人。

『羅馬教皇想保持其中立的立場，對速不台自由處理天主（原文有誤）教國之事，究竟要求過怎麼樣的事情還不大明白……但是，教皇他拖延其聖戰的宣告實情，曾極為明顯。他漸漸開始堅固其戰爭的決心是，係在西歐國民公開責難教皇之後，也是在羅馬（日爾曼）皇帝遇害，教皇曾召集蒙古軍等之謠言廣為流

傳的時候。」（摘自連緣庫著作）

雖然如此，但是對此移到後面再進一步詳細說一說，從此就遠征俄羅斯之準備期間擬予進行研究。據伊瓦尼恩將軍的說法，拔都的連續性勝利，和祖父成吉思汗一樣，決不是以野蠻性的勇猛心和托多數人的福而來，是基於依完備的軍隊組織，綿密的戰鬥準備，有關敵方之正確情報的設想等等。這些個情報如同在第六章所說，類似參謀本部軍官一樣的人員，通過所謂「油爾討吉」（註二）之稱的人士所蒐集者。『據鋪來諾卡爾批尼（旅行家，曾為羅馬教皇特使——譯者註）所証實，蒙古人想征服歐洲之腹案已有了十八年之久。這由早就預先蒐集有關歐洲的情報，以及擬妥征服計劃之事可以看得出來』（摘自伊瓦尼恩著書），就像這樣，蒙古人之對俄羅斯，或者所謂之塔塔爾人的「侵入」，都會是有組織性的軍事行動。到後來開始發動征服歐羅巴之遠征軍的領導人是速不台。對此有若干著作家都有同樣的看法。

對征服俄羅斯的預定兵數，沒有正確的資料。並且，成吉思汗征服中央亞細亞時所準備的兵力，依當時蒙古帝國情況其兵力最大限度數量，也不會超過二十三萬，超過此數之說更是一大疑問。雖然從成吉思汗時代到那個時代為止業已過了十七年，這個期間國境已擴大，人口也增加了。可是隨之而來的是，在東部（中國）及南部（波斯）之新的國境，需要更進一層的堅固保障。如此之說是，這方面雖然大規模軍事行動宣告結束，但是現在稱宋或稱印度的非平定鄰國，以強國的姿態重新登場所致者。

俄羅斯年代記記載，把拔都會向俄羅斯進軍之大集團兵力之「無限的偉力」，曾形容如下：其軍力所通過之處「大地戰慄而鳴叫」云云。如此的評價，那不用說可能由於誇大估計了強大敵軍力量之自然趨勢而來。尤其是據伊瓦尼恩將軍的著作，拔都軍

力總數達六十萬人之說。惟這可能不是僅指這一次征服遠征軍而言者，這可能是把於一二四一年中央亞細亞戰役之後所去參加的兵力也加進去了。這個一二四一年之說的此一年度，拔都滯留於南俄羅斯草原，把在其東部歐羅巴的支配力強化之後，又利用被征服民族強化了自己軍隊力量的那一年。這種被征服民族當中，曾有過無數的遊牧份子，這在蒙古軍來說乃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有關此事，在伊瓦尼恩將軍研究拔都軍由各種族構成一書中有特別詳細的說明。據此，曾在拔都軍中的蒙古人及「於成吉思汗時代早已被征服的」種族，共計有過十六萬四千人。但是，從成吉思汗死後到遠征俄羅斯初期為止的九年之間，自於求赤領土之內未曾有過重大勝利一事觀之，到一二三六年為止從「被新征服」的民族當中會能集聚到那麼多數的四十萬人等之說法乃是一件不可能之事。類似事情若在一二四〇年年末時期，換而言之就是把東部歐羅巴業已平定終了時期或許有可能。

除以上之外，六十萬之說法的人數當中，也可能不僅指戰鬥員數字而言，或許把在軍中服務的很多非戰鬥員數字也包含進去了。

若是比較正確一點想像的話，於一二三六年向俄羅斯征伐的拔都軍戰鬥成員算起來可能有從十二萬二千人到十五萬之間。又假設說若是沒有上述的兵力，與俄羅斯諸侯分散的兵力作戰，當然不能不沒有充分勝算的把握。拔都軍的大部份由在求赤境內的回教徒所組成。其中當然還有已去之求赤兄弟們的自身軍隊在內，這就是察哈台、拖雷及窩闊台皇帝。換而言之，全部軍力的三分之一由純粹蒙古軍所佔。全軍之中，由蒙古人所佔有的指導位置頗為廣闊。他們在人數上比蒙古人多出很多的外國混合軍中，或在由異種族編成的軍隊內，雖然在數字上所佔有的比率有限，

但成為拔都軍的精華，進而強化了拔都軍，並且於緩慢中極巧妙的在同化非蒙古軍。

拔都遠征軍於一二三六年春初，從伊爾道葉西河上流諸地點，並由西阿爾泰方面開始進軍了。經過歷史上著名的烏拉爾伽利利關口開始佈置廣闊的戰線當中，六月已經到達了標爾嘎。速不台爲了討伐喀木斯克地方的保加利亞人，由此處率領軍的一部離開了本隊。蒙古軍對此保加利亞人，從自一二三三年進軍以來，即抱有怨恨。這即當時哲別及速不台一隊要通過保加利亞國境附近時，受到保加利亞人的襲擊曾受到損傷所致。

對上述之怨恨，蒙古軍現在得到了很好的復仇機會。據歷史文獻記載，把保加利亞人一個接一個的大部份都予以殺掉，其中故意留下了僅少數部份活著的人，他們才有逃走的机会。這是爲了想擴大散佈當時的戰況由蒙古軍方面主動設計發出去的傳說。在這一次戰爭中，蒙古軍雖發揮了極爲殘酷的戰爭行動，但這僅不是單一爲了渴望達成復仇的心願而所實施者，其意圖當然是由於爲對將來敵人心中植下具有效果的恐怖觀念而來之事似無疑問。

然而在這個時候，上述的方法沒有收到所預期的效果。這就是蒙古軍攻入俄羅斯諸侯所管轄之各範圍時，到處受到頑強的抵抗，對拔都的歸降要求，他們以殺害使節來答覆。舉其一例言之，拔都先遣其王子滿古爲使者前往基輔時，他們一行曾被殺害而告結束。

一二三七年，蒙古軍以拔都爲先頭部隊逐次到達了俄羅斯土地。這個猶爲於一二三三年哲別或速不台爲先頭部隊襲來時期之情勢一樣，不是到俄羅斯土地尋找親密友情而來的，爲的是在此地與自己求得納貢者或尋覓奴隸起見曾所襲來者。

速不台攻擊保加利亞人期間，拔都以其主力予以佔領了波羅比埃斯人、堡爾塔斯人、茅庫上人、莫羅道比人、卻爾凱斯人等所有地方，因而到一二三七年爲止，當時更深一層席捲了從伽利利海到地中海爲止的廣大俄羅斯南部草原地帶沒有什麼所剩的全部進入其掌握中。從高原人及遊牧人立場看起來，這真是一個好地方，拔都軍力在這個俄羅斯南方草原把一二三七年的整個這一年差不多都在此地渡過去了。

到初冬季節，蒙古軍侵入利亞贊公國。孤立無援的利亞贊諸官吏，嚐到了無可比擬的敗北滋味，蒙古軍遂佔領布蘭斯克，開始包圍攻擊利亞贊。利亞贊從一二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開始，受七日包圍之後，由拔都軍的強襲終於陷落。

從此冬季正酣時，拔都引軍指向北俄羅斯，由此可以證明，蒙古軍對土地狀況與季節性的條件等研究到爲何的正確以及使人驚異性步。這就是這個地方的自然性障礙存在著有無法克服的困難，換而言之，這個地方的山川、湖沼、山林等等不當一會事似的可以順利進軍時期，於一年之間僅有在這個時期，並且利用原始性交通也唯有靠堅實的冬季結冰，因而除此一時期之外更別無法。

雖然如此，最初攻擊俄羅斯南部諸侯，把這些個降服之後才開始輪到俄羅斯北部諸侯，從戰略性觀點看，很可能會引起比這個再沒有更好之作法否的疑問。對此一問題，伊瓦尼恩將軍雖有否決性的答復，實際上，對此一計劃也無法表達出贊同之意。這即譬如說拔都開始攻擊了俄羅斯南部，比南方諸侯更有力量力的北方諸侯國可能更有時間來整飭軍備準備攻擊，南方諸侯之軍力，戰爭尚未結束之前可以向北方退卻，似可與北方戰友聯合起來強化裝備。於爲此條件之下，北方諸侯的反擊行動可能延續到道路

泥濘時期也不一定，若形成那種情勢，拔都的騎兵（不能忘掉之事是，拔都的全軍會都是騎兵）勢必全陷入於最困難狀態。所謂一舉攻破北方諸侯之方針，就是讓戰友持有只在極短的一次攻擊中把他滅亡掉之希望。當然，冬季行軍不會有錯的是還有很多不便之點，其中最成問題的是，沒有充當飼料用的綠草，若是要發生不足之問題，可以從當地土著民眾那兒徵收食糧或乾草來代替之，並且以積極性的攻擊要塞這個時期是最好時機。說起來那是什麼原因呢？在對守護要塞者這進行土木工程困難，城壕溝被冰封閉或被雪掩蓋所致者也。

如斯，佔領利亞贊之後，拔都緊急迫近科羅本那，在這兒給與俄軍新的打擊。於是蒙古軍毫無困難的把莫斯科納入於其手中，把這兒的商品倉庫貨物得到之後，決定轉向其首都烏拉吉米爾，於一二三八年二月三日迫近此處。將該市僅經四日予以佔領。從利亞贊到莫斯科，更進一步由烏拉吉米爾之移動戰，拔都迂迴其最大敵人斯紫塔爾國王猶利雅之右翼，從這兒切斷了其向北方之退路，若不切斷其北方退路，猶利亞大公可能會與大挪比高老道及布斯靠夫軍隊聯合起來。這項從北方自己的翼有受到被攻擊之危險原因，拔都向洮爾吉庫派遣了特別隊。

爲了得到向北方發展之據點，斯紫塔爾軍不能不尋求迴路。爲此下西奇河方向，可能佔領了位於現在的陶別爾斯喀牙及雅羅斯拉夫斯喀牙兩縣境界的從烏古利奇到別究斯庫途中的陣地。但是如依伊瓦尼恩將軍所云，『拔都軍的移動技術和其迅速性把大公的預定計劃給擾亂了』。這就是因大公也判明了其右方已被包圍之事，於三月四日之最不利條件下陷入於不能不戰鬥之境地。在西奇河的戰鬥中斯紫塔爾軍以大敗告終，士兵及大公自身也沒有什麼所剩餘的被殺戮殆盡而告結束。爲了知道拔都軍行動有過

如何的威力，下面的事情可以瞭解到。從佔領烏拉吉米爾市時開始到西奇河戰鬥時期爲止的一段期間，拔都把俄羅斯諸公國中最有力量者，就是把烏拉吉米爾斯凱（斯紫塔爾）公國的所有城塞都市均予以佔領。

蒙古人從得到西奇河勝利，也很迅速的攻陷了洮爾吉庫和斯比由利。拔都即轉向而進出於大挪比高老道了，在這兒曾建立不讓挪比高老道軍力和布斯靠夫軍力相互合併可能之戰術方針。唯迫在眉睫的雪溶期即將來臨，因之他到了三月未變更其初志，如此他到挪比高老道之二百俄里（——一俄里——一〇六六公尺——譯註）地點即撤返南方。

埃木伊，伊瓦尼恩將軍對拔都爲適應實際狀況具有如此決斷力之表現，除述有爲下之意見。

『拔都可能於四月中旬到達挪比高老道是不會有錯。可是這個地方，以時節來說，一到三月中河川或湖沼開始解冰有大量的積雪溶化。蒙古軍從利亞贊超越一千俄里的距離（註三）大部份都通過從未曾有人走過的積雪上面而來的。能夠採取如斯斷然行軍，唯有草原民族的騎兵才有可能。雖然是那樣，他們也不能不克服種種實際上的困難才會達成這項目的。可是置於他們前途的仍不遜於此的種種困難還有很多。這就需要克服溶雪期間涉渡森林或湖沼的困難，廣佈的武裝都市不能不作包圍，又面臨挪比高老道附近潮濕草原馬來說是不大喜歡吃的飼料，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到家畜流行病發生的危險，另外，包圍戰若有拖延時間時，軍的糧食供給問題不可避免的又要發生困難……因而他距挪比高老道尚有二百俄里之地點，把挪比高老道或布斯靠夫一帶之富足商業都市中的糧可到手的戰利品均一一放棄，把軍隊撤向後方了。可能知悉上述危險情勢所以有如此行動。又當時富足之稱的商業

都市斯茅連斯庫的得以平安無事渡過，可能基於上述原因也不一。』（註四）

就拔都撤返南方之事，以現代年代雜誌家來講，連一點最貧乏的資料也沒有提供到。只把靠塞利斯庫市經過六日防禦之有關事實，以及蒙古軍超越該市，向著通河支流與下流往波羅比埃斯人地方去的經過略有記載而已。

其後，拔都軍隊採取了如何的行動也只有最貧乏的資料可循。然彼大概是進擊北俄羅斯後，想是在南方俄羅斯草原給與軍經過二年時間的長期休養。尤其是他利用這一段時期，想像到的事情可能是實施整飭於前冬的戰鬥中蒙受到的不大不小之若干騎兵組織之損傷。由南方俄羅斯所惠予的地勢性，季節性的條件下，征服這個地方的諸公國之事，無疑的蒙古軍更要加倍努力的價值所在。

南方諸公國都市中，就以最堅固之稱的卻爾尼告付市來說，被蒙古軍佔領的時期，年代誌中什麼事也沒有記載。對此事稍為明確一點的是，只是蒙古軍包圍此一街道時，曾使用大石塊投擲之事而已。佔領南俄羅斯之大概順序為，揣想是拔都從草原迫入，首先攻陷古爾毫輔，然後大破卻爾尼告付，再進一步移向別利雅斯拉比力及基輔之可能。經如此南俄羅斯草原對拔都軍隊才形成了具備一切好條件的騎兵軍可休養的良好根據地。

到一二四〇年，蒙古軍以龐大的軍力接近了基輔。採取此項行動之其必要原因是，從曾被稱為『俄羅斯諸都市之母』之稱的基輔市，只是僅僅為了照著豫想開始反擊行動（這不成為其最大目的），其真正目的是蒙古軍想從這兒抱著有更進一步開始討伐北俄羅斯之希望哉。並且，於事實上，在一二四〇年之祭祀尼公萊那當日（據某些歷史家們的意見說此日是五月九日，據其他

很多人的說法十二月六日），作短期間之包圍基輔後，受到遊牧民之嚴重打擊終於陷落了。街道被破壞，殲滅了其住民。此後，蒙古軍攻落嘎利西亞諸公國，續之進出於卡爾巴察山麓一帶地方了。

平定俄羅斯地方事業以此終於結束。

拔都潰滅了俄羅斯諸公，讓他們成為進貢者，受到絕對歸順的承諾，不用顧慮其後方，開始著手準備征服所謂殘餘的歐羅巴大事業了。當時的政治情勢對他這種企圖很有利。何以這麼說呢？就是因平常就埋頭於鬧內訌中的歐羅巴諸國領袖，另一方又無理會羅馬教皇，想依其權威把他們全體都統一起來之對抗其共同仇敵亞細亞軍的立場，如同前述，於下此一重要決心之際都躊躇不前所致者。

蒙古軍到達了卡爾巴察地方之後，由拔都召開的軍事會議席上，諸將領一致決定再向歐羅巴腹部深處更當採取積極性的進擊行動。與此同時當然還有應所必要的藉口伴隨著。這藉口就是匈牙利提供給與從蒙古軍率領敗兵四萬人逃走的昆公可隱藏之家。這個敗兵就是給蒙古軍自己納貢者，而且曾被認定為奴隸者的波羅比埃斯人。拔都與匈牙利王別拉四世發出最後通牒，向該國再要求引渡於他國內逃遁的波羅比埃斯人，若不聽時威脅以訴諸於戰事手段來解決之。別拉國王拒絕了蒙古軍的要求，於是言語的衝突而轉變為武力的衝突。這個時候，蒙古軍把武力使用範圍，毫無考慮的擴大到匈牙利之鄰近諸國。自己軍隊的左右不准有不必要的武力存在，若任由其原樣存在對自己不利之事，乃是蒙古軍的正確想法，因之他們（蒙古軍）對此項存在也向不存有任何親善性交往企圖，同時也認為無此必要。

蒙古軍以一部對付波蘭，其一是為偵察，另一個是以掠奪為

目的，從到達基輔之後，即早已派遣，其中一隊於一二四〇年即到達疏布林，由那兒攜帶所獲的戰利品經嘎利西亞返回了基輔。另外一隊雖攻佔了散道米爾，並也會到達庫拉靠，但是沒有成功而告落幕。因有了這樣的結果，勢必要保護其右翼的安全。由此目的的分別派遣了兩個強力部隊出發。一個開向波蘭，另外一個開向希來加及茅拉比亞。為掩蔽左方目的，又派遣了一支與此同樣程度之軍隊經由陶蘭希爾比尼亞前往。拔都統率於自身下的主力遮斷與卡爾巴陶聯絡之敵的路線當中，採取最近道路從基輔附近進攻了布達佩斯。側面隊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強化這個防禦線。又命側面隊，於匈牙利之事情俟告一結束時要與主力合併。

上述任務首及尾一切均進行得圓滿。被命攻擊波蘭的一隊是由王子班塔爾率領，在西道羅夫附近與敵致命一擊使敵軍澈底的潰敗。（往希來加及茅拉比亞方面被派遣的部隊也善於遵行了班塔爾命令），此後，蒙古軍佔領了庫拉靠把它予以燒掉，渡過歐疊爾河進攻至布列斯拉比利為止。布列斯拉比利市雖經他們本國人手予以燒掉，但是，從城塞裏曾有過頑強的抵抗。然而，班塔爾在卡斯巴哈河畔因得到有強力敵人在利古尼斯附近有整飭軍備的情報之故，解除了布列斯拉比利城塞的包圍，集中自己所率領之二隊的兵力，近頭痛擊具有三萬之眾的敵之大軍。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在利古尼斯附近激戰結果，殲滅了德意志及波蘭騎兵精華，蒙古軍也曾遭受到重大損失。然而，勝利的結局則歸於班塔爾方面。

戰鬥正在激烈當中，勝利即將歸於敵方之瞬間機會也曾之出現過。可是蒙古軍以彼等獨有的方法堅強的忍受過去，終於很成功的克服了這種困境。對此，波蘭年代誌家，德意志年代誌家，也都以很驚異的筆法予以記載。說起來是什麼原因呢？那個方法

就是，在蒙古軍來說，雖然是一個最普通的戰法，但依歐羅巴人的想法，彼等完全認為一套異常的戰法，猶如假裝逃走把敵引出之方法即其一例，敵人中其計追蹤而來，在敵不意中即行逆襲將敵予以粉碎。蒙古軍在這一次也使用了此種方法收到了意外成功的效果，得到了於喀爾喀河戰鬥時燬滅俄羅斯諸公一樣程度的成果。

蒙古軍對騎士軍的勝利，依以下的理由具有特記之價值。就是在利古尼斯戰役中可以判明亞細亞戰鬥技術的確是優於西歐之事，同時，蒙古軍在亞細亞是第一優秀，而騎士軍在西歐也曾是第一優秀，故蒙古軍的這項勝利，可以越趨証明到蒙古軍實在完全俱有征服全西歐的真正實力之事。

經如斯，把波蘭及曾支持它的德意志條頓軍，從拔都軍敵陣中除掉了。由於掃清利古尼斯一帶，蒙古軍攻入茅拉比亞，將戰火氣息已帶到捷克邊境。捷克王阮塞斯拉夫（即瓦斯拉庫）不敢與蒙古軍作野戰，在本國的邊界外守護其國，並且仰望於同盟者的援助很快就把他本國棄之而去了。於捷克人手中遺留下來的城鎮，例如布爾諾或敖羅茅斯的防禦，統交由從斯帖倫別爾古市趕來的勇敢軍指揮官雅羅斯拉比來處理。雅羅斯拉比很巧妙的把這項任務達成了。唯這絕不是把蒙古人的進攻給阻擋住了。總之，忠實於固有有用兵原則所謂在移動中求取勝利的彼等蒙古軍，把有反擊行動的城塞迂迴而去是他們的常事，敖羅茅斯城也可能依此例而漏掉。可是到了以後，蒙古軍對反擊的城塞也統統實施包圍。在最初階段，雖然是沒什麼用也會提出過談判之要求，接著此一支軍與攻入匈牙利中心部位很深的拔都之主力部隊會合，共同擔當了征服之任務。

註一：歐伊拉圖人在成吉思汗軍中，參加了所有行軍。居住於現在準噶爾的歐伊拉圖種族中，如今仍成為蒙古民族中之最西部民的喀爾瑪克即屬於此一系支，他們居住於標儒嘎、道恩、北高加索之間。阿斯討拉汗喀爾瑪克、斯大比羅寶爾喀爾瑪克，以及道恩喀爾瑪克人現在已形成著一個喀爾瑪克自治州。喀爾瑪克之稱的名稱，彼等大部份隨著吾布吾希汗復歸準噶爾之後（耶卡帖里拿二世時代），給安頓在俄羅斯南部者。

註二：油爾塔吉（或稱討吉）之語源是油爾討，其意思遊牧帳棚，在和平時期他們尋找水草豐富的遊牧場所，在戰時其任務為偵察敵情。

註三：這都是往主要方向的里程，曾負有特殊任務的每個部隊，可能大部份都通過了更遠的距離。

註四：中止佔領那比高老道的拔都，與一八一二年充滿迷夢欲佔領莫斯科而把自己軍隊陷入於滅亡境地的拿破崙比起來，實在可以說得起，具有先見之明的將軍。

（文接22頁）

③7：同治朝《始末》，第六十七卷，第四一六頁。

③8：中俄雙方在烏克克會議上議定：因穆羅姆佐夫系幫辦，烏里雅蘇台地段界牌設置完畢，界圖繪好之後，先將應交中方的俄圖由榮全蓋印簽字，交穆羅姆佐夫帶回，巴布科夫簽字蓋印並寫出俄文記約後交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轉給榮昌轉給榮全。

③9：同治朝《始末》，第六十七卷，第三十四—三十六頁。

④0：同治朝《始末》，第六十八卷，第四十六—四十七頁。

④1：同治朝《始末》，第七十一卷，第十頁。

④2：一史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外交類，第五一四卷，第二號。

④3：《清穆宗實錄》，第四十七卷，第十六—十八頁。一史館藏：上諭檔，一二四八號文件。

④4：一史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外交類，第五〇八卷，第一號。

④5：一史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外交類，第五一四卷，第五號。

④6：同治朝《始末》，第十八卷，第四十三—四十五頁。

④7：《清文宗實錄》，第三五六卷，第二頁。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三編，下冊，第一二一〇、一二一一、一二四二頁。

④8：《清穆宗實錄》，第一〇八卷，第二十三—二十四頁。

④9：同治朝《始末》，第三十三卷，第九頁。

⑤0：同治朝《始末》，第三十二卷，第三頁。

⑤1：一史館藏：朱批奏折類，外交項，第三八六號。同治朝《始末》，第三十三卷，第九—十一頁。

⑤2：一史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外交類，第五〇三卷，第四號。同治朝《始末》，第三十五卷，第六十八頁。

⑤3：同治朝《始末》，第三十六卷，第九—十頁。

⑤4：同治朝《始末》，第六十卷，第四十頁。

⑤5：一史館藏：宮中全宗，民族類，蒙古項，第二八四卷，第十號。

⑤6：一史館藏：宮中全宗，民族類，蒙古項，第三九九卷，三號。

⑤7：同治朝《始末》，第六十七卷，第三十五—三十六頁。

⑤8：一史館藏：宮中全宗，民族類，蒙古項，第三九九卷三號、四號。同治朝《始末》，第六十六卷，第十九頁；第六十七卷，第四十一—四十一頁。

「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系列演講」摘要(五)

維吾爾族的社會與文化

林冠群（政大民族所教授）

今天很榮幸能到國父紀念館向各位介紹維吾爾族。對有這麼多朋友能冒著溽暑，來此聽一場比較冷門的學術演講，本人願意表示十二萬分的敬意。現在先談一下我的求學過程。以前我在大學學的是土耳其文，相當冷門。入學時有二十五個同學，人數不少。二年級時已轉走了十二人，二下時又轉走了五個人，三年級時只剩下八個人了。上課時教室大、人少，空蕩蕩的連回音都聽得到。等我考上邊政研究所時，同學就更少了，所裏分東北、新疆、西藏、蒙古等四組，當時我們西藏組只有我一個學生，四、五個老師教一名學生，所以我常想我可能是全中華民國最幸運的研究生。有時我會開自己玩笑，向別人說：「邊政所就是在政大旁邊研究。」因為政大開的法、商類研究所都十分熱門，只能用萬頭鑽動來形容，那會如此冷清？

其實邊政所的重要性，並不能只看這些表象。少數民族人數佔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而這百分之八的人口卻佔有中國百分之六十四的土地，這些邊疆土地一直是我國維持國防、供應物資的生命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大開辦這個研究所來維持對邊疆起碼的認識，也確有必要。

我學土耳其文同邊政所研究的維吾爾文又有什麼關係呢？其實這兩種語言關係密切，他們都是突厥語的一支，單字有百分之六十相同，語法一樣，像我這種會土文的人，見到維吾爾族人，只要花上三、四天工夫相處，掌握一些維語語音變化規則以後，就可以相互通話了，因此當我從土文組畢業，再到邊政所學維文

時十分輕鬆愉快，所以我的土文基礎對我研究維吾爾族的幫助不小。

現在，我們正式來瞭解一下「維吾爾」是什麼？為什麼要去瞭解「維吾爾」呢？

今天我帶來了兩張中共百元、十元的鈔票展示給各位看。各位可以看到這上面有維吾爾族人的圖像，還有維吾爾文、藏文、蒙文、壯文等少數民族文字。從鈔票上來看，就可以知道中共是相當重視少數民族的，中共為什麼這麼重視少數民族呢？因為中共崛起與少數民族息息相關。當年國民政府五度剿匪，中共自稱是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少數民族曾寄望於中共建政後給予自主權；而對中共的逃竄多所庇護。故當中共一九四九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就對各少數民族施行了許多優惠政策以為回報，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讓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了。鈔票上印了少數民族文字與圖像，就是其中最明顯的証例。但是，中共做事許多方面都脫不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少數民族事實上還是在中共的掌握之中，一天也沒作過主，只有形式上自治罷了。而且，各民族間的民族關係依舊緊張，民族教育更是不足。就拿去年（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廿五日我在北京的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天我從北京藏學研究中心出來，看到幾個說漢語的男人，蹲在地上對路過的藏族婦女的傳統服飾指指點點，品頭論足，訕笑不斷。試想，中共民族平等的口號喊了四十多年，而實際的教育成果表現在生活上的竟是如此不堪，漢族民族中心思想依然作祟，又怎麼能做到民族和諧、民族團結呢？因此，我

個人認為我們應當見不賢而改之，加強這方面的教育與認識，從了解維吾爾族做起，踏出自省的第一步。

古代中國使者到北方見到維吾爾人時，會問他們是那一族？

維吾爾人說：「我們是uigur。」從此uigur之名就成為維族的稱呼了。這種稱呼在漢文中的異寫有三、四十種之多，像回紇、袁紇、韋紇、回鶻、畏兀兒、畏吾兒等都是，近代新疆還有人用「威武爾」的，這些變化到民國廿三年全部統一，由政府正式定名為「維吾爾」而沿用至今。查維吾爾之原意為「團結」的意思。維吾爾族以前是居住在貝加爾湖畔的狩獵民族，他們靠著聯合其他的部族，逐漸壯大，以致在族稱上會有「團結」的意思。維吾爾族曾與漢使蘇武間有一段故事。史書上說蘇武牧羊北海邊時，「丁令盜其羊」，丁令就是維吾爾人的祖先，北海就是貝加爾湖，狩獵民族見羊心喜，蘇武又人單勢孤，自然就發生了盜羊的事。後來丁令這個民族逐漸由北方遷移到蒙古、新疆、甘肅一帶，才成為維吾爾族，唐時維吾爾族稱為回紇，逐漸取代了突厥的霸主地位，而稱霸大漠南北，維吾爾族之所以能稱霸大漠，全是靠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手法，會用這種手法的民族當然十分聰明。那時唐太宗打敗了突厥，回紇是第一個派使者來進獻「天可汗」尊號的，由此可以看出維族的祖先，有很高的政治智慧。

回紇稱霸了大漠南北以後，成了一個標準的游牧民族。因為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上，最適合游牧生活了。游牧民族社會是一個無法自給自足的社會，因為他們食用的穀物，要依賴農業社會供應，日常所食的乳製品，要靠農業社會提供器械來貯存、製作、武器也需要農業社會來打造，所以這種游牧社會對農業社會的依賴很深，當時的南疆塔里木盆地，正是綠洲所形成的農業社會

，是回紇社會生活物質最大的供應來源。偏偏當時的新疆，卻落入了回紇敵人吐蕃（西藏）人的手中，吐蕃勢力大到攻陷了唐朝首府長安（西安），甚至立了金城公主的外甥當傀儡皇帝。維吾爾人力不能敵，就聯合唐朝想奪回新疆。當時唐朝也苦於藏人不斷入侵，也定了一個「聯回抗蕃」的政策，共同來對付藏人。

這就形成了一個很罕見的現象，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不但沒有乘中原朝廷之危入侵中原，反而與中原合作，共同對付西方的強敵。當然，唐朝當時也有實質的回饋，來安撫維吾爾人；那就是「絹馬交易」。當時河西走廊的產馬區亦盡入藏人之手，唐朝的軍馬來源成了問題，馬匹的重要性，可由軍事專家估計，七個步兵才能對付一個騎兵看出。唐朝就以內地盛產的絹帛，與維吾爾人換馬，維族所在的大漠南北盛產馬匹，以絹換馬，可說各取所需。初時以一匹絹換一匹馬，後來因維吾爾人抬高馬價，成了四十匹絹換一匹馬，來馬又多，動輒萬匹，唐朝國庫空虛，苦不堪言，但又不得不勉力巴結奉承，以免這個實力強大的朋友變心。

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維吾爾人的經濟智慧。當時的維族是有力量入侵中原，但是他們並沒有如此做，因為出兵要付出遭到抵抗的傷亡代價，還不如坐收絹馬交易得到實質利益來得划算。絹帛當時是國際商品，可外銷歐洲，是很珍貴的衣料。這種高超的商業頭腦，使當時的回紇獲得了比入侵中國還要大的利益。

回紇汗國由於長期養尊處優，國力漸衰，公元八四〇年時，受到柯爾克孜族的攻擊，汗國破滅。當時維吾爾人分三支遷移，其中一支建立了甘州回鶻汗國，一支建立了高昌回鶻汗國，一支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維吾爾人到了新疆以後，大部份轉業成了農耕民族，只有極少數人依然游牧，這種變化是十分具有戲劇性的

。因為游牧民族一向自視甚高，常將農業民族視為生產穀物的奴隸，予取予求。而此時，維吾爾人自己反倒成了農業民族，由掠奪者變成了被掠奪者，其改變不可謂不大。後來的蒙古人、西遼人都曾以游牧者的「高貴」身份來宰治農耕的維吾爾人，就是這種戲劇性變化的結果。

在中國歷史上，唐朝與維吾爾人還有一段戲劇性的聯姻關係，值得一提，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亂起，唐室為之大亂。唐肅宗即位後，為力圖挽救危局，以親生女寧國公主嫁至回紇葛勒可汗，完成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和親。因為自漢朝有和親政策以來，都是將皇室的旁系血親嫁給對方汗王，還沒有那一個王朝將真正的公主嫁出去的記錄，而寧國公主開了這個記錄，為兩個民族間血統交融史上又譜出了新的一頁。

談到維吾爾人的血統，我們就會想起維吾爾人的外貌。現在大家都刻板的認為維族像歐洲人，這真是維吾爾人以往傳統的面貌嗎？其實古代的維吾爾人，長得與我我相似，是純種的蒙古種人。西遷以後，才與新疆當地的伊朗裔土著混血，而有了現在這種外貌，而當年遷往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鶻，卻仍保有祖先的大部份血統，現稱裕固族。「裕固」、「維吾爾」這兩個詞在維語上發音是相同的，有相同的祖源。由於生活環境不同，現在才有了二種不同的族稱。裕固族有一個有趣的習俗，就是一個人要取三個名字。第一個是生下來就取的族名，如勇士（*baturu*），三歲時要取一個經名，如慧日（*logsomilina*），這是由於裕固族人信藏傳佛教，經名用藏語。七歲時為了入學，得再取一個學名，像安立民、安自強之類，學名用漢語。這三個名字可隨環境變化使用，例如在家用乳名，到廟裏拜佛用經名，到社會上工作時用學名，研究維吾爾族的人必不能忘了研究裕固族，因為他們的語

言中，還保留了許多古代回紇時期突厥語的特徵，在血統上，他們比維族更接近古代回紇。

維吾爾族到了新疆後，逐漸信奉了伊斯蘭教。由於宗教關係，他們的族稱也由維吾爾分化成喀什人（*kashgarlik*）、和闐人（*hotenlik*）等等，二十世紀以後，才又逐漸走回統一，通稱維吾爾。在民族識別上，維族與哈薩克族的區別在語言上，這兩種人雖然都信奉伊斯蘭教，但維族說突厥語，回族講漢語，不會混淆，另外在生產方式上，維族是全家一齊下田，不論人口多少，都靠一塊田生活，而回族就會精打細算，常將田中多餘的人力調出，外出打零工、做生意賺錢，因此，回族大多富有，而維族常感貧窮。

維吾爾社會與伯克制度有密切的關係，伯就是中國字的「伯」字，表示官位與財富。清末民初每縣的大伯克仍保有「鄉約」的行政權力及大地主的地位，縣署對維人的政令下於鄉約，鄉約再轉令千戶長（明伯克）、百戶長（玉資伯克）等，階級分明。在宗教方面，維族聚居區中有完整的伊斯蘭教區制度，阿湊、伊瑪目等神職人員指導教徒禮拜及生育、婚姻、喪葬等生命禮俗活動，統治力常超出宗教生活。由於維族所居的綠洲，水利系統等於生命線，為農耕生活所必需，而鑿井、修渠的維護費又是以戶為單位分攤，十分繁重，所以維族為規避稅賦即儘量不分家，以致形成龐大的大家庭，大家長具有極大的權威。也由於財產不輕易分割，所以維族除了吃同一母親奶水的不能通婚外，常常親上加親、近親通婚，而罕與外族通婚，由於語言不通，維族、回族雖同樣信奉伊斯蘭教，但互不通婚，維族的族外婚只限於信伊斯蘭教的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塔爾等族。

維族人離婚手續非常簡單，只要丈夫在二名証人面前對妻子說三聲（talak）塔拉克，妻子就得乖乖收拾行李離去。如果丈夫只說一聲塔拉克，妻子離開後間隔一百天，丈夫還可以經阿潭福証，與妻子復合。若丈夫說了三聲塔拉克，那就得等六個月又十天，妻子改嫁後再離婚，丈夫才有權要求破鏡重圓。離婚妻子再嫁前的生活費，必需由男方負擔，依伊斯蘭教法規定，維族男人可以娶四名妻子，但由於通常妻子不得外出工作，除了大富豪外，罕有男人能供養四名妻子的生活費，故一般人都只娶一房。維族重視婚姻，要求新婚需為處女，新婚之夜若不見落紅則有權退婚。故維族喜好近親聯姻，基於家醜不外揚的心理，正可避免發生萬一時的尷尬。當然，中共統治新疆後，婦女地位提昇，上述陋習已大有改善。

吃食上維人喜吃麵餅，當地人稱為「囊子」或「饅頭」。吃囊子時配合飲用奶茶，節慶時才吃米飯，以手抓食稱「抓飯」。維族人把包子叫饅頭，以羊肉為餡，維語中有不少漢語，像桌子、白菜、筆、笨、凍等詞都與漢語同音同義。

再談一些有關維族文學上的成就，維吾爾族有一本文學名著叫「福樂智慧」，書中記述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式，認為理想社會中要有知識、法律、道德，缺一不可。這本書寫於十一世紀，含有很高深的哲理。政大黃啓輝教授曾為文指出，本書有許多章節與四書有不謀而合、異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另外「突厥語大詞典」也是維族的一本名著，記述了十一世紀當時的維族諺語、詩歌，是研究突厥族系地理、歷史、文學上不可或缺的寶典。

談到維吾爾族，就不能不提到新疆問題。民國成立以後，新疆的民族問題日益嚴重，五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鏡頭並不罕見。以往維族佔新疆人口近九成，如今只

佔百分之四十六，維族心中的疑慮日益加深，要求獨立的聲浪高漲，民國三十三年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釀成的。

要促進民族團結，維族的前立委阿不都拉先生說得好：「中國就像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每個民族都持有股份，只要國家進步、社會安定、經濟發達，相信沒有那個股東願意退股的」，要做到這個地步，唯有先從加強相互了解、學習互相尊重做開始，方克有濟，這也是我今天來講維吾爾族最主要的目的。（張華克記錄）



此次大會中展示的
民族服裝，係由新
疆伊犁察布查爾縣
六牛泉西門市場
吳秀珍女士（前排
左四）及其兩位美
麗的女助手（前排
左一、右一）精心
製作

中國邊政協會第卅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一、時間：八十五年元月廿七日下午十二時卅分

二、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六十一號集賢廳

三、主席：林恩顯

記錄：馬普東

四、出席：包克、李啓元、呂秋文、佟福森、林通光、翁福祥、

曾慶輝、楊樹森、趙振續、趙覺、廣定遠、馬普東、

劉學鈺、樊開印、關紹蘊、蕭金松

請假：朱泓源、那思陸、哈勒楚倫、阿不都拉

五、主席致詞：略

六、工作報告：略

七、討論事項

(一) 擬本會八十五年度會員大會議程乙種，提請討論案。

決議：通過，如附件一。

(二) 本會八十四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二），提請審查案。

決議：聽取常務監事翁福祥代表監本會審查報告後，通過。

(三) 擬本會八十五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三），提請審查案。

決議：通過。

八、臨時動議

廣秘書長報告：中國邊政雜誌社副主編李憲章先生長年奉獻本會至多辛勞，近因年事已高，將返大陸故鄉定居，其副主編工作將改請會員張華克先生接任在此報告。

九、散會：下午三時。

附件一

中國邊政協會第三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議程

一、時間：八十五年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三時

二、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聯勤信義俱樂部集賢廳

三、議程：一四：三〇——一五：〇〇 報到（領取資料、中國邊政雜誌、繳會費）

雜誌、繳會費）

一五：〇〇——一五：〇五 主席致詞

一五：〇五——一五：一〇 內政部長級指導致詞

一五：一〇——一五：二〇 貴賓致詞（蒙藏委員會）

一五：二〇——一五：三〇 會務報告

一五：三〇——一六：〇〇 討論提案

一六：〇〇——一六：一〇 臨時動議

一六：一〇——一七：五〇 學術座談會

主題：兩岸關係——以少數民族交流的問題、政策及

展望為中心

引言人：（一）喬健（東華大學族群關係及文化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二）蕭金松（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教授）

一八：〇〇——恭賀新春聯誼活動（摸彩、聚餐）

政治大學民族所鄭月裡同學主持新疆民俗

歌舞表演

附件二

中國邊政協會八十四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84.1.1—84.12.31）

歲 入		歲 出	
上 年 度 結 餘	入	中 國 邊 政 雜 誌 出 刊 費	出
七六、四一・〇〇		二二四、二五八・〇〇	
有 關 機 關 補 助	三五四、〇〇〇・〇〇	打 字 印 刷	一二、四一〇・〇〇
利 息 收 入	六、一五四・〇〇	郵 電 費	一六、二二〇・〇〇
會 費 收 入	八、〇〇〇・〇〇	開 會 餐 費	四六、二〇六・〇〇
其 他 收 入	一三、二〇〇・〇〇	文 具 雜 支	一三、六一〇・〇〇
合 計	四五五、九六五・〇〇	演 講 車 馬 費	五四、〇〇〇・〇〇
		本 年 度 結 餘	九九、二六一・〇〇
		合 計	四五五、九六五・〇〇

附件三

中國邊政協會八十五年度歲入歲出預算表（85.1.1—85.12.31）

歲 入		歲 出	
上 年 度 結 餘	入	中 國 邊 政 雜 誌 出 刊 費	出
九九、二六一・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有 關 機 關 補 助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打 字 印 刷	一五、〇〇〇・〇〇
利 息 收 入	六、〇〇〇・〇〇	郵 電 費	一五、〇〇〇・〇〇
會 費 收 入	一〇、〇〇〇・〇〇	開 會 餐 費	五〇、〇〇〇・〇〇
其 他 收 入	一三、〇〇〇・〇〇	文 具 雜 支	一五、〇〇〇・〇〇
合 計	四二八、二六一・〇〇	演 講 車 馬 費	五〇、〇〇〇・〇〇
		預 備 金	八三、二六一・〇〇
		合 計	四二八、二六一・〇〇

中國邊政協會第卅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記錄

一、地點：八十五年元月廿七日下午三時

二、時間：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六十一號集賢廳

三、主席：林恩顯

記錄：陳秀清

四出席：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

過去一年中國邊政協會的工作成果，除了一般事務出版「中國邊政」雜誌之外，並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了一系列的中國少數民族演講會，共辦了十三場，並錄音於電台播放，同時亦摘要刊登於「中國邊政」雜誌上，對於大眾的社會教育當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其次，另一項比較特殊的工作，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在北京舉行的「兩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與教學研討會」，由本會主辦，政大民族系所及北京中央民族大學藏學所協辦。參與會議的人數多達一百餘人，是相當大的一個會議，在中國大陸引起很大的影響。對於兩岸少數民族學術研究教學的交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以今年五月份將再度邀請大陸十五所民族院校的院長、來台灣訪問研討，是本會在兩岸少數民族研究方面所盡的又一分心力，敬請各位多予指導協助。

此外要感謝許多會員們協助各項會務工作的舉辦，也感謝行政院陸委會、蒙藏委員會、教育部的支持。最後感謝各位今日的參與並請踴躍發言。敬祝新春吉祥。

六 貴賓致詞：蒙藏委員會楊主任秘書仁煌：

過去一年來中國邊政協會的工作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在國父紀念館舉辦了十三場演講，以推廣社會教育；兩岸交流的活動共舉辦了四次，口碑頗佳；另外還辦了五場學術演講座談會。可見去年的工作是非常豐碩成功的。

蒙藏委員會對於中國邊政協會的補助預算雖減少，但貴會的活動卻並不因此而減少，反而增加，這是非常值得肯定之處。蒙藏委員會今後將會與貴會做密切的聯繫與支援。

七 會務報告（廣秘書長定遠）

（一）舉行各種會議

1. 八十四年二月十一日舉辦會員大會。
2. 舉辦理監事聯席會議四次。
3. 舉辦秘書處同仁會議兩次。

（二）按時出版學術刊物

本會出版「中國邊政」季刊四期（一二七、一二八、一二九、一三〇）。

（三）舉辦學術演講與座談會

1. 本會八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李委員長厚高在會大會上講「蒙藏委員會的政策方向」。
2. 四月二十二日在本會辦公室舉辦「談我國少數民族罵人藝術座談會」。
3. 四月二十二日在本會辦公室舉辦「如何增進兩岸少數民族交流活動座談會」。
4. 十月七日在台北蒙藏文化中心舉辦劉義棠教授榮退演講會「畏兀兒亦都護城」。
5. 十一月十一日在台北本會辦公室舉辦大陸學者陳慶英教授

講「談蒙藏關係」。

（四）推廣社會教育

本會八十四年元月至七月間在國父紀念館舉辦「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系列演講會」計十三場，並錄音在廣播電台播送，摘要在本會「中國邊政」季刊登載。

（五）促進兩岸學術交流

1. 八十四年元月十四日在台北政大舉辦「兩岸少數民族研究與教學概況座談會」。
2.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北京舉辦「海峽兩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與教學研討會」有兩岸學者百餘人參加。
3. 本會曾慶輝理事在大陸甘南藏族中等專校設置獎學金暨捐贈教學設備。
4. 籌備「邀請大陸民族院校長來台訪問活動」計畫案。

八 討論提案：

（一）本會八十四年會務工作報告，提請審議案。

決議：通過。

（二）本會八十四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提請審議案。

決議：通過（見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附件二）。

（三）擬本會八十五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提請審議案。

決議：通過（見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附件三）。

（四）擬八十五年度本會會務工作計畫要點草案，提請討論案。

中國邊政協會八十五年度會務工作計畫要點草案

一、按期召開理監事暨會員大會。

二、按時出版「中國邊政」季刊（年四期）。

三、舉辦學術演講與座談會。

四、促進兩岸學術文化交流。

五增進會員聯誼。

決議：通過。

九臨時動議：

(一)廣秘書長提：

中國邊政雜誌社內部人事有一些易動，副主編李憲章先生因年事已高，將回大陸故鄉定居，其工作將交由會員張華克先生接任。在此提出說明。

(二)林理事長提：

本會常務理事蕭金松教授及理事曾慶輝先生，對於推展會務工作不遺餘力，貢獻良多，在此建議大會通過頒予二人獎狀各一頌，擇期於理監事會議上贈送。

決議：通過。

十學術座談會：

主題：兩岸關係——以少數民族交流的問題、政策及展望為中心

(一)引言人報告：

(1)喬健（東華大學族群關係及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蕭金松（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教授）

甲、喬健教授——

有關兩岸少數民族關係交流的問題，政策與展望，我在此提出三個方向的問題供大家思考：

1.有關少數民族歷史來源的問題——

現在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研究逐漸成爲一個熱門課題，在探討的時候，總是會牽涉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灣原住民究竟是從那裏來的？過去研究資料不多不足，總是想當然耳，認爲台灣原住民是從東西亞飄洋而來，但是現在很多考古學上的証據証明，反而認爲在廣大的太

平洋上分布的南島語族，可能是從台灣過去的。但不可能是從台灣發源的，因爲在台灣還未找到更古的人類或文化遺跡，最早只有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所以它的溯源一定是在中國大陸。那麼台灣原住民的來源究竟是中國大陸的那些民族？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所以要追溯台灣原住民的早期文化，必然要到中國大陸去追溯。

凌純聲先生過去就提出一個非常大膽的假設，認爲台灣原住民的來源在中國華南地區，且把現在的台灣原住民與中國歷史上的百越民族關聯在一起，列出五十幾條兩者的共同點。可惜凌先生過逝之後，對於台灣原住民問題的研究出現了空檔，突然之間國內學者對它沒有興趣了，所以這個問題也就沒有人再繼續研究下去。

現在兩岸至少恢復一定程度的自由來往，這個問題也是可以重新看待的時候了。有關台灣原住民來龍去脈的問題，在學術研究上也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空間可以加以發揮。

2.在民族學的研究上，如何加強兩岸學者的合作與交流方面的問題——

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態度相對於其他國家（例美國之對於印第安人）來說比較寬容，種族歧視的問題不那麼嚴重，所以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大部分亦保有自己的語言及文化。但大部分少數民族並沒有被太多的學者研究過，相對來說在民族學上，在人類學上，還是一處未開發的處女地，有非常豐富的材料、題目供大家去做研究。故對於民族學者或人類學者而言，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大的寶藏。

但是我們研究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不只是因為他們的特殊文化值得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們都與我們漢族息息相關，過去和平相處了幾千年，漢族的文化裏有少數民族的影子，少數民族的文化裏也有漢族的影子，但是到後來還能各自保有自己民族的特色，這是非常難得的現象。所以去了解少數民族就是幫助我們了解自己；而且在某些情況之下也可以做為一個對比，很有價值。

例如西南瑤族與漢族同為父系社會，但家庭組織、婦女地位、婚姻制度等等，和漢族都不一樣。為什麼同為父系社會，卻有這樣的差異，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又如過去台灣阿美族的母系社會現已解體，但現在卻能從傣族、納西族等同為母系社會的民族裏看到阿美族過去的現象。

所以很多情況，不僅是學術上的內容，同時它與我們過去的生活、現在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這一類的研究不只是學術上的興趣，也是實際上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問題。而進行這些研究，就需要中國大陸相關學術單位的協助。今年五月貴會邀請十五位民族相關的大學院校的校長要來台灣開會，我們可以在此先想好題目或對象，等他們來台時正可提出來與他們共同策劃合作。

3. 在民族政策方面——

國民政府對少數民族有其自成一套的政策，而中國大陸上中共政府也有他們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將來海峽兩岸的接觸愈來愈多，這兩個政府的政策必然會互相影響，不太可能行其是，而台灣所受到的中共的影響可能

要大些。例如中共有所謂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自治鄉等，將來有一天台灣原住民也可能會提出同樣設立自治行政單位的要求，如何去因應這方面的影響，解答這方面的問題，是很值得去思考與研究的。

而中共對台灣九族籠統地分類成一「高山族」，與我們的分類不同，事實上他們的分類是不科學的。這也是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之一。而「原住民」一詞，中共方面是否接受，也是未來兩岸有待思索的課題。

此外中共對少數民族有一定程度的優惠政策，在未來兩岸交往頻繁之後，在台灣方面也可能會有人提出類似的要求來。諸如此方面的民族政策問題，兩岸相互間的影響是免不了的。在此我們對於這方面的問題應該要多加思考，以期達到兩岸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協調。

乙、蕭金松教授——

少數民族交流是原是兩岸多項交流中的一個不起眼的部分，但是如何把這個不起眼的部分之重要性強調出來，以及如何在這個領域空間內加以發揮，這是我們所要去探討的一個問題。

中國邊政協會的任務，除學術研究的推動之外，主要還是在促進少數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團結。過去因侷限於對中國大陸的情況不很了解，所以本會的工作主要以本島的少數民族為對象，但自從兩岸開放以來，使得本會未來發展的空間更加廣闊。所以如何配合現實環境的改變，如何善用機會，多多盡我們的一分力量去發展海峽兩岸有關少數民族的交流，這個重要性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兩岸交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之下，

充分發揮各自所長，並截取對方優點以補己方之不足，二者充分結合，截長補短，俾使雙方都能獲益。

首先，大陸能提供給台灣方面的幫助如下：

(1) 研究材料的取得方面，過去我們一直非常缺乏，但現在大陸方面不僅有古籍資料的整理，翻譯和出版，同時也進行多次民族學和語言學的田野調查。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次：一是各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調查，前後共八年時間，材料涉及所有少數民族，而且在進行社會歷史調查的同時，亦拍攝了影片和照片，在三十幾年後的今天來看，可以說是彌足珍貴。

當時所做的各種採訪當中，也記錄了許多民族學的材料，有的已出版，有的尚未出版，將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這些材料都可供我們利用。

中國大陸的學者，雖然也應用這些基本材料做了一些研究，但通常都跳不出社會主義唯物論的框框，因而很難呈現出少數民族正確的全貌。但在台灣，由於學術自由，再加上我們可以應用歐美西方許多先進的研究方法，所以將來運用這些材料再加以研究，基本上仍有許多發展空間。

其次大陸對少數民族語言學上的調查也陸續完成，至今可以說已全面建立了有關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資料庫，同時也陸續出版各語言研究的專書。這些都可以提供給我們對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參考題材。

(2) 中國大陸提供了田野調查的廣大空間。不管我們從事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或人類學的調查，要研究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就必須到中國大陸去進行田野工作。

基於上述的需要，加強兩岸少數民族學術研究交流是必要的。

至於大陸方面對台灣的需求也有以下兩點：

(1) 多與台灣來往，向台灣介紹大陸少數民族的情況，使台灣大眾有所了解，有助於化解兩岸尖銳的對立。

(2) 台灣的經濟發展，提供的研究空間與經費，在令大陸學者羨慕，所以他們也希望能獲台灣方面研究經費上的幫助。這也是他們要求兩岸交流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下面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近十年來兩岸有關少數民族議題交流的情況：

(1) 學術上的交流——主要是出版品的開放。出版品的開放是促進學術研究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因素。

(2) 研究訊息的交流——隨著期刊、專書的取得，使我們能夠掌握到大陸上研究少數民族的相關資訊。

(3) 刊物的發行——大陸上有幾種刊物是少數民族研究很重要的參考，包括民族語文方面的研究、民族學、民族文學等等相關的刊物。

台灣的「民族研究會訊」（前身為「西藏研究會訊」）亦向大陸方面出版發行。

(4) 新的研究機構的成立——特別是大陸藏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在大陸上算是規模頗大的機構。台灣則曾經成立了「西藏研究委員會」、「邊疆問題研究委員會」。

(5) 兩岸學術會議的舉行——最近幾年兩岸學術會議的舉辦愈來愈頻繁，同時亦逐步朝向兩岸「合辦」學術會議的方向來努力。例如去年在北京與中央民族大學合辦的學術

會議，引起大陸學界普遍的重視，甚至要求以後能繼續合辦會議，因為透過這種合作，兩者都是主人，在探討問題上，比單方面所舉行的會議要來得自由、熱烈。去年初在台灣舉辦的兩岸蒙古學、藏學研討會，也是一個大規模的學術會議里程碑。

(6) 合作研究計劃的推行——在台灣方面研究少數民族的人力相當有限，在人力的動員上往往處於單打獨鬥的局面，比較難進行大規模、全面性的研究。將來如何從事跨學科、跨族際的研究，就需要大家共同來思索。從這一點觀之，兩岸應大有合作的空間。

(7) 少數民族文物及表演藝術的交流——目前兩岸交流的程度已經可以到表演團體的互相往來，以及大陸的文物可以在台灣各地展出。所以如何促進少數民族文物在台展出，甚至於在台灣成立少數民族博物館，並促成藝術表演團體來台演出等等，都是以後促進兩岸交流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至於兩岸在推展國際學術活動上，也可以配合兩岸交流的方向來推動。但大陸方面並不接受在台灣所舉辦的國際會議，因為大陸視台灣為其「地方政府」，所以在台灣舉行國際會議對大陸學者的邀請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將來如何克服這方面的困難，值得深思。

(二) 綜合討論：

發言一：

關於台灣原住民與中國大陸，尤其華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的關係，應可從語言研究方面著手，因為語言是最保守、改變最少的文化遺產。至於文法上的變異則不是問題。

喬健教授說明：

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是屬於南島語族，目前發現其基本上分佈在海洋，在大陸上尚未發現這種語族。前面曾提到按照凌先生的假定，這支語族應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但是中國大陸並沒有講南島語的民族。比較接近的是南亞語。現在語言學家所努力的方向就是在找出南島語和南亞語的關聯。而另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是從「遺傳因子」方面著手，找尋二者的關係，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應該是更可靠的。

發言二：曾慶輝先生

1. 這次本會邀請大陸十五位民族院校的校長來台，是否能請其提供介紹該校特色的錄影帶，我們可以轉錄，以作為中國邊政協會未來的參考資料，甚或可對教學上有相當大的幫助。

2. 能否請蕭教授說明一下，目前大陸所製作有關少數民族的錄影帶有那些？是否能介紹一下他們拍攝的成果及工作情況。

林恩顯教授說明：

目前我們所想到要請十五位院校長提供的資料有：(1) 各民族學院的簡介、創校簡史、課程表等；(2) 各院校的老師們的著作目錄；(3) 各院校的學報或代表性刊物。此外，我們有三場研討會，我們希望每一場都有一個大陸方面的發言人，並請他們能各寫出一份五千字的引言報告來，如此研討起來才會具體的內容，才會深入而獲益多。最近我們還會行文給台灣各相關院校科系及研究機構等，請他們提供一些與這次研討會有關的意見，或是他們希望和大陸的那一個民族院校合作，我們邊政協會可以做一個仲介。

蕭金松教授說明：

邀請十五所院校的校長來台，是本會長期規劃的工作項目之一。在去年就曾贈書給十三所民族院校，這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邀請他們的院長來；第三部分可能我們要邀請他們的學生代表來，和我們的學生做一個交流。

實際上民族院校只是少數民族教學的單位，真正做研究方面，除中央民族大學做得較好外，其他民族院校所做研究並不普遍。真正做少數民族研究工作是在中國社科院之下的各地民族研究所，其下又包括民族語文、民族學、民族史，甚至還有世界民族、民族理論等不同的研究室，其規模相當龐大。所以下一步我們要進行交流的對象應該是這些研究單位，包括各省區的社科院之相關研究所。

至於他們所拍攝的四十年前的影片，有一百多部，但因目前大陸普遍向「錢」看，所以這些都要賣錢，而且賣得相當貴，慢慢走向商品化，要進行這方面的交流恐怕不容易。而大陸許多學術單位亦希望能拍攝一些學術影片，可惜沒有經費，所以期望能和台灣合作，找人投資拍攝。

發言三：（樊開印先生）

在中國大陸做研究，限制非常之大。這次本會能把大陸民族院校的校長請來這麼多位，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希望能透過這次的研討會來影響他們，以克服這方面的問題。在此提供幾點意見：(1)好好招待他們，走的時候送他們一些東西；(2)幫他們多換一些美金回去。希望經由我們「賓至如歸」的招待，能使他們未來在學術研究的交流上給我們更多的幫忙與通融。

林恩顯教授說明：

在大陸上做研究的確有很多限制，所以我們也要給掌管業務的單位有機會來台訪問，這個事情才能推得動。所以這次我們除邀請十五位校長外，還另外邀請了兩位秘書，目的就在使大陸方面的主管人員也能享有利益。

發言四：（張存武先生）

1. 本學會的工作，一方面是實務，一方面是學術研究。就學術研究而言，我們是比較開放的，大陸近幾年雖也開放，但相對來說仍相當封閉。所以在研究方面，有些地方我們還是可以影響他們的。譬如大陸的民族研究，是否參考其他國家的研究？例如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移民社會，他們所做的關於民族研究的概況，我們應可提出來與大陸學者討論。

2. 兩岸文化交流的活動中，雙方各有何缺點，應該集思廣益來討論之，以做為改善的依據。例如大陸方面不接受我們所召開的國際會議，這是個非常無理的態度，我們便應提出來與他們討論，以期達到雙方的共識。

3. 目前中國少數民族也有很多人流落到國外去，例如藏族到印度去，其生活文化方面的適應如何？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東南亞的民族又有什麼關係？諸如此類居住在海外或跨國境的少數民族之研究，應多加留意。

喬健教授說明：

1. 若要到民族地區去做研究，最直接的一條路就是去找當地的「民族事務委員會」，並直接找主管協助。這個方法是最簡單且最便捷的一條路。通常以旅遊的名義進行，且因為都是講普通話的中國人，所以一般說來沒什麼困難。

2. 有關民族方面的影片，中國大陸在五〇年代末至六〇年代

進行民族識別工作的時候，拍了大量的記錄片，是他們沒有工業化、現代化以前的情況，非常珍貴，但很難取得，主要是因為中共不太願意讓外人看到當時落後的一面。若透過特殊管道應該還是可以取得。

3. 將國際上對少數民族的研究概況介紹給中國大陸的學者，是一個很好的意見。但必須注意，目前國際上所發展出的一些理論，未必符合大陸的民族政策，愈與他們的政策有所衝突就愈麻煩，所以在介紹這些理論的時候要特別小心謹慎。

發言五：（呂秋文先生）

1. 剛才提到未來本會將邀請大陸少數民族學生來台進行學術交流，但我們知道少數民族學生來台，其人選可說都是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決定，所以對於我們所欲邀請的學生，我們也要事先同主管官員聯繫好，因為來不來之權由其決定。

2. 關於開會的「名義」，也要事先取得共識。

發言六：（趙振續先生）

1. 關於錄影帶的取得，前幾年大陸「遼金史協會」製作了一套遼金史的錄影帶，內容包括遼、金時期的遺跡、古物等，當時我亦覓得一套，大約在七〇年代。在此建議，若要找這方面的錄影帶就要趕快把握時間。

2. 台灣原住民的來源一般都認為從海路來，但是否也可以換個角度，先從陸路上來思考。先經過喜馬拉雅山，再從喜馬拉雅山到達馬來半島。馬來族認為他們的民族主要來自於馬來山，而馬來山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明白指出即喜馬拉雅山。所以走陸路到馬來半島，然後再到南洋，

最後再到台灣，這也是一條路。在此提出供大家參考。

發言七：（曾慶輝先生）

1. 大陸方面對於來台進行交流的人選名單的確意見頗多，像這次欲邀請十五位民族院校的校長，就遭遇同樣問題。但我們都已盡量和「民委會」溝通協調，所以這十五位院長都已獲得「民委會」的同意了。

2. 建議希望這十五位院校長能提供他們學校有特色的錄影帶，尤有甚者，請他們也能提供各民族有特色之物，例如服飾、藝術品：等等，以後這些東西就成了中國邊政協會寶貴的資產。

汪幼絨女士——書面意見：

建議除了學術研究、教學方面的交流外，在推廣宣傳方面也應多加交流，例如台灣：

(1) 中小學的原住民九族鄉土文化教學（教育部）。

(2) 文建會推廣的各族豐年祭。

以此吸引社會大眾人士關注，並凝聚原住民社區之活動力。如何讓社會大眾了解大陸少數民族，欣賞少數民族，進而尊重少數民族，相信是促進族群和諧相當重要的工作。大陸方面應也有相關的機構做此工作，這些也可以交流，做些心得意見的交流。尤其服務少數民族基層的工作人員，其經驗尤應借重交流。

朱泓源先生——電話意見

建議海峽兩岸少數民族研究者合組相關研究團體進行長期性交流合作。

(三) 結語——林恩顯理事長

感謝兩位引言人、九位發言人的熱烈發言討論提供寶貴

（文轉7頁）

大會集錦

中國邊政協會第三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八十五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台北市信義俱樂部召開，會議中除有學術座談外，並進行了各項聯誼活動，過程平順，氣氛熱烈。

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蕭金松教授到會演講



蒙藏委員會主任秘書楊仁煌先生於大會中發言



意藏



政治大學民族所四位研究生表演滿族舞蹈，右起：鄭月裡、夏允方、鄧琪瑛、趙子瑩。

政治大學民族所研究生黃旭慶在會中介紹滿族、維吾爾族服裝

編後語

張華克

熊文中一再提到《維吾爾研究》一書及其作者劉義棠先生，認為大陸學者劉義棠先生對古代維族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各方面均有相當的研究，成果豐碩。其實據我們所知，劉先生另外在維吾爾語文方面的探討，亦是成就驚人，大陸學者王遠新先生曾在《中國民族語言學史》一書中以十頁的篇幅專節介紹劉先生的著述，該節的標題是「台灣的突厥語研究，可見同樣是大陸學者，也有人將劉義棠先生歸類為台灣學者的。其實要知道劉先生是那裏的學者，只要翻一翻本刊上（一三〇）期劉義棠教授榮退學術演講會摘要記錄一文，即可明瞭，我們在此不再多說。

惟我們想認真思考的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本為同根生，既經常難分清彼此，相煎又何必太急？近來中共在基隆港、高雄港海外試射飛彈，弄得台灣、福建兩省人心惶惶，都以為難免一戰，使許多民間交流的活動，也都停頓了下來，其影響不可謂不大。而導彈試射除了擾動人心外，也打掉了不少人心中的統一信念，許多原先堅持大一統觀念的人，現在都疑心自己是不是搞錯了方向，因為中國人向來愛好和平，是沒有人喜歡同整天試射導彈，進行軍事演習的人講統一的。

因此，我們在此希望這些助長台獨聲浪的導彈試射、軍事演習趕快停止，也希望大家能堅持維繫和平、繁榮局勢的初衷，努力化解兩岸間的鴻溝，促進統一的一日早日到來。相信，這不只是在台灣的各民族的想法，即使遠在新疆的維吾爾族，也會對我們這種共存共榮的概念表示欣然同意的。

（作者為本刊副主編，現任滿族協會理事）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及文化研究所喬健教授在大會上致詞

本期我們可以看到大陸學者熊坤新先生對維吾爾族先民——回鶻研究的概述，很湊巧的，本地學者林冠群先生一篇維吾爾族的社會與文化的演講稿，也適時刊出。由此顯現出，海峽兩岸對維族的研究均相當重視，而且也都十分深入。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 一、本刊以報導會社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至於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甚歡迎，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影本。
- 三、所有文稿除滿蒙維藏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加標點繕寫，附註則請依編號順序集中排列於文末，以便編排。
- 四、來稿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刊出後版權歸本刊所有。
- 五、發表以真名為主，請勿一稿兩投或抄襲轉載。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職業、專業背景，俾便刊出後奉酬。
- 六、來稿請寄本社或台北市徐州路五號四樓劉學銑先生收轉均可。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 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 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一三一期

名譽	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宋	念
社長：李	啓
主編：劉	學
電話：三五六六一八	〇
副主編：張	華
電話：三六三四四六	二
業務經理：馬	普
電話：七二〇三四七	七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本社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七十五號三樓	
三〇二室	
電話：三六五二〇七	五
印刷者：公館打字印刷行	
地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一號二樓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四	